

分类号: D61

密 级: 不公开

学校代码: 10363

学 号: 2211510118



安徽工程大学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 目 马克思信用理论及对我国
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论 文 作 者 黄玉学

指 导 教 师 方前移教授

学 科 (专 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 究 方 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论文提交日期: 2024 年 6 月 7 日

分类号: D61

单位代码: 10363

密 级: 不公开

学 号: 2211510118

题 目 马克思信用理论及对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英文并列

题目 MARX' S CREDIT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OUR COUNTRY' S CREDIT RISK PREVENTION

学生姓名: 黄玉学

指导教师: 方前移

专 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论文答辩日期: 2024 年 5 月 29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黄玉学

日期：2024 年 6 月 7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10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黄玉芳

指导教师签名：方丽珍

日期：2024 年 6 月 7 日

日期：2024 年 6 月 7 日

马克思信用理论及对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摘 要

早在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就在对西方学者相关信用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研究过信用的生成、内涵、形式，以及信用与虚拟资本、信用与流通手段、信用的作用等内容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信用理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信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各种信用风险，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信用风险虽然来源变得更广，形式更加多样，但是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先进的数字技术等优势，为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探究提供了最新的应用工具支持。马克思信用理论虽然诞生于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撇开其中的制度因素，其关于信用的系统论述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研究依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危机等理论的研究很多，而关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所以加强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系统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文章首先从“信用”和“数字经济”的界定展开，从而奠定文章论述的概念基础，然后分为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分别为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历史生成，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内容体系和马克思信用理论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了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原因等生成条件，以及理论生成所历经的萌芽、成熟和完善三个阶段。第二部分的论述则主要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对于信用的系统性论述。马克

思的信用理论内容体系完整，论述较为严谨，所以本文第二部分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逻辑，先后论述信用的形式、信用与虚拟资本、信用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的作用等内容。第三部分则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指导，利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最新生产要素和先进数字技术，探究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当前我国的信用风险主要集中于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虚拟资本方面，而利用好马克思信用理论可有效防范化解这些信用风险。

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系统研究，探究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重要启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信用风险问题的防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实现数字经济的接续发展和马克思信用理论的丰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信用理论，信用风险防范，数字经济，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资本

MARX'S CREDIT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OUR COUNTRY'S CREDIT RISK PREVENTION

ABSTRACT

As early as in the 19th 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y, Marx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studied the generation, connotation and form of credit, 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credit and virtual capital, credit and means of circulation, and the role of credit and gradually formed Marx's credit theory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relevant credit theories of western scholars. Market economy is credit economy, while cred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increases various credit risks, thu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lthough the source of credit risk has become more extensive and the form is more diverse, the new production factors brought by the digital economy-data, as well as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and other advantages provide the latest application tool support for China's credit risk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Although Marx's credit theory was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y, despite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its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credit still has theore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our country's credit risk preven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a lot of studies on Marx's theory of money, surplus value and economic crisis, but relatively few on Marx's theory of credit, so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credi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first starts from the definition of "credit" and "digital economy", thus laying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the article discussion, and then divides into three parts to discuss, respectively,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of Marx's credit theory, the content system of Marx's credit the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s credit theory to our country's credit risk preven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he first part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oretical origin and practical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as well as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The discussion of the second part is mainly based on Marx's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credit in the fifth part of Volume 3 of Capital. The content system of Marx's credit theory is complete and the discussion is more rigorous, so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form of credit, credit and virtual capital, credit and money circulation and the role of credit according to Marx's logic. The third part is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Marx's credit theory, using the latest production factors and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o explore the countermeasures of our country's credit risk prevention. At present, our country's credit risk mainly concentrates on commercial credit, bank credit and virtual capital, and making good use of

Marx's credit theory can prevent and solve these credit risks effectively.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f Marx's credit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credit risk prevention in our countr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will not only be beneficial to the prevention of credit risk in our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ich development of Marx's credit theory.

Huang yuxue(Marxist theory)

Supervised by Fang qianyi

KEY WORDS: Marx's credit theory, credit risk prevention, digital economy, commercial credit, bank credit, virtual capital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第 1 章 绪论	1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
1.1.1 选题的背景	1
1.1.2 选题的意义	1
1.2 研究综述	2
1.2.1 国外研究现状	2
1.2.2 国内研究现状	4
1.2.3 对既有研究的评价	7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8
1.3.1 研究的思路	8
1.3.2 研究的方法	8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8
1.4.1 研究的重点	8
1.4.2 研究的难点	9
1.4.3 研究的创新点	9
1.5 相关概念界定	9
1.5.1 “信用”的界定	9
1.5.2 “数字经济”的界定	11
第 2 章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历史生成	13
2.1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条件	13
2.1.1 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	13
2.1.2 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理论渊源	15
2.1.3 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现实原因	18
2.2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过程	20
2.2.1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萌芽	20
2.2.2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成熟	21
2.2.3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完善	22
第 3 章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内容体系	24
3.1 信用的形式	24
3.1.1 商业信用	24
3.1.2 银行信用	26
3.2 信用与虚拟资本	28
3.2.1 信用形式创造虚拟资本	29
3.2.2 收入资本化创造虚拟资本	30
3.3 信用与货币流通	32
3.3.1 信用与国内货币流通	32
3.3.2 信用与国际货币流通	34

3.4 信用的作用	38
3.4.1 信用的积极作用	39
3.4.2 信用的消极作用	42
第 4 章 马克思信用理论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46
4.1 对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46
4.1.1 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与主要风险	46
4.1.2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	51
4.2 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54
4.2.1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现状与困境	55
4.2.2 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	58
4.3 对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启示	61
4.3.1 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诱因	61
4.3.2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对策	63
结语	67
参考文献	69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77
致谢	78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1.1 选题的背景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在对西方学者信用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研究过信用的生成、内涵、形式，以及信用与虚拟资本、信用与流通手段、信用的作用等问题。马克思关于信用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于《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而且他还计划在“六册计划”中对信用问题展开更加详细和系统的研究。近年来，理论界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商品货币理论、经济危机等理论的研究不可谓不多，而关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研究却显得相对不足，还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信用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其在推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信用风险，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在当前国际局势风云诡谲，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数字经济背景下，信用风险的来源变得更广、形式更加多样，对信用风险防范的要求也变得更高。我国虽然已在信用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但在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的防范方面依然存在不足，而且这些信用风险颇有加深的趋势。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会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发展和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所以对于信用风险防范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

1.1.2 选题的意义

理论意义：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通过对马克思信用理论中的信用的生成、内涵、形式、作用，虚拟资本和流通手段等内容研究，来探究我国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资本等领域所存在的风险问题及防范对策。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相关理论和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而且还有利于马克思信用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现实意义：

马克思信用理论重点论述了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资本及其正反作用等内容。

运用马克思信用理论去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资本领域所存在的风险问题，进而充分发挥信用的积极作用，探究信用风险的防范对策，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信用风险的防范化解，而且有利于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进而赋能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1.2 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2.1.1 关于信用形成的研究

马克思关于信用形成的论述是基于职能资本家之间开展的商业信用行为基础上提出的，而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信用形成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述类似。杜冈认为，货币虽然能够解决商品交换的区域障碍问题，但是商品交换往往还存在时间障碍问题，即交换的商品可能不会同时存在。“那么，要克服因不同时间生产商品而出现的障碍，就要利用信用。”^[1]这种交易被称为信用交易。可见，杜冈关于信用形成的论述也是建立在商业信用行为上的，而且他还驳斥了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将道德层面的信任因素作为信用基础的论述，认为信用活动的开展还是需要建立在物品信用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各种物品的抵押和保证上。^[2]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认为“信用首先表现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变化的简单结果。”^[3]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给货与付币不需要同时进行，支付在出卖行为实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才发生。希法亭认为货币支付手段职能出现的时候，信用其实已经出现了。

1.2.1.2 关于信用与虚拟资本的研究

关于虚拟资本的形成，鲁道夫·希法亭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收入资本化可以创造虚拟资本，而且，希法亭重点以股份公司的股票为例详细论述了收入资本化创造虚拟资本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每一个货币额都产生收入，从而每一种收入都相反地表现为一个货币额的果实。”“这种证券资本的虚拟的、纯粹计算的性质便完全无可怀疑了。”^[4]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认可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主要来源的观点，即股票、公共债券和信用货币是虚拟资本的三个主要来源。此外，沙奈还对虚拟资本的新发展作了很多的补充研究。他认为，“作为虚拟资本的信用货币当时只涉及不受黄金储备保证的信用货币，而今天，我们完全是以这种货币形式进行操作的。”^[5]洛仁·戈尔德纳（2008）认为股票、债券、土地和不动产租金是虚拟资本的表现形式，而且他将虚拟资本界定为是超过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权凭证，是超过其自身价值的全部能够产生收入

的资产的资本化现值。^[6]戈尔德纳关于虚拟资本的界定基本就是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界定的翻版，即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凭借各自的信用工具促进虚拟资本的产生，以及收入资本化能够创造虚拟资本。

1.2.1.3 关于信用作用的研究

鲁道夫·希法亭信用的扩张促进了银行的出现，而银行可实现支付的集中和地方差异的消除，可使“闲置的货币资本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转化”，“收集和集中一切在其他所有者手中闲置的货币，然后把它们贷放给生产资本家。”^[7]也就是说，信用的扩张发展，可以将生产阶级与非生产阶级的闲置资本都提供给产业资本使用，进而扩大再生产规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驳斥了希尔德布兰德主张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信用可使生产资料转到最干练的人们手中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信用不仅做不到更公平的分配生产资料，反而还会使生产资料更加集中，使资本统治得到全面发展。“资本家利用信用，不仅成为自己资本的统治者，而且还成为别人资本的统治者。”^[8]德国共产党创始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认为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增加生产力”和“充当交换的媒介和促进交换的进行。”^[9]当生产的无限扩张要求与有限的私人资本相冲突的时候，信用的介入就可缓解这个冲突。信用可实现众多资本集中，使资本家能够更多的支配他人的资本。Korefumi Miyata（2016）则在货币资本积累与实物资本积累的关系研究中详细论述了信用对资本积累的作用，并认为这是信用主要作用的表现。^[10]

1.2.1.4 关于信用与危机关系的研究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虽然很多观点与马克思相左，但在信用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上，他却与马克思的看法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杜冈认为，正是由于信用的存在，以个体自主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制度获得了特别的发展，其中就包括经济危机的爆发。同马克思一样，杜冈也认为信用只是加剧经济危机的一种因素、一个条件，而不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扎得要更深些，它寓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中。”^[11]罗莎·卢森堡认为“危机是从生产的膨胀能力和膨胀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12]，而信用又具有增加生产力的膨胀能力，以及充当交换的媒介，进而促进商品交换的两大职能。由此，卢森堡得出结论，“信用恰恰是使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发作的特殊手段。”^[13]可见，卢森堡同样认为信用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诱发经济危机的特殊手段。

Grazziotin, Henrique de Abreu (2021) 等人认为信用虽然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但是信用基础一旦减弱,就会出现贵金属外流的情况,而贵金属外流问题的加重对危机的爆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贵金属的外流减少了央行和私人银行黄金的储备量。银行家对其借贷资本的减少感到担忧,进而缩小信用规模,提高利率。当危机爆发时,由于信用的稀缺性导致再生产停滞不前,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出现闲置。^[14]Trigg Andrew B 与 Graziotin (2021) 等人的观点类似,他同样认为,在信用体系中,当债务与信用通过清算达到平衡时,商品货币是不需要的,也就是信用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但是,一旦这种平衡关系出现中断,债务就必须用现金结算,商品货币重新成为偿还债务的支付手段。当危机爆发时,偿还债务的黄金和纸币会从银行系统中流失,导致银行黄金储备量的减少。^[15]

1.2.1.5 关于信用风险防范的研究

关于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研究,Edward I. Altman (1968) 提出采取量化管理的方式防范信用风险,强调信用风险评估对于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他创建了 Z 值模型,用来定量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以此协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控制信用风险。^[16]Lyle S. Alexander (2004) 则给出了预防信用风险和提高信贷资产盈利性的一些步骤,例如,对贷出资产的可回收性进行比较、关注借款企业的经营比率,以及设定最低还款保证,在信贷合同执行过程中,把握借款人的还款能力等要点。^[17]Asif Saeed 和 Qasim Zureigat (2020) 重点展开对商业信用的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投资将有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从而更好开展商业信用活动并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18]这些研究从多方面、多角度探究了信用风险防范对策,其给出的相关对策建议对于信用风险防范工作的展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2.2.1 关于信用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

洪文金、高路明 (1988) 从高利贷信用到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信用来研究马克思信用理论内容中信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认为信用最古老的形式就是高利贷信用。高利贷信用的产生与商品流通,货币交换和货币的支付手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借贷由实物形态发展到货币形态,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又为高利贷信用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高利贷信用虽然仅适用于一个以乡村经济为特征的社会需要,但是其利用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到了资本主义阶段,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信用行为愈

发多的出现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商业信用开始出现，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资本主义信用中介的银行也开始出现并形成了银行信用。^[19]尹莲英、高晓红（2004）则主要从信用产生的原因这一层面去研究马克思信用理论内容中信用的形成和出现问题。他们主要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去论述信用形成和出现的原因，认为信用是货币出现和运动的必然结果，与货币经营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对高利贷资本扬弃的结果。^[20]靳永茂（2022）从经济和伦理两个维度对马克思信用理论进行了研究。在经济维度上，他从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演进、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性推进和高利贷资本的历史扬弃三个层面论述了信用的历史生成问题。^[21]

1.2.2.2 关于信用形式的研究

汤在新（1995）认为马克思主要论述的信用形式是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并同时指出了这两种信用形式的信用工具，此外，他还增加了对于消费信用和民间信用的论述。^[22]洪银兴、葛扬（2011）关于信用形式的论述主要为虚拟资本的系统论述服务。他们认为信用可分为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消费信用等，并且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信用形式主要就是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国家信用。^[23]邱海平（2016）则认为商业信用的对象主要是处在资本循环阶段上的商品资本，其主要发生在职能资本家之间。商业信用在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同时，也会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加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风险。银行信用方面，他认为银行信用的出现突破了商业信用的局限性，是资本主义垄断产生的重要基础。他认为银行信用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银行信用可以加速资本集中，进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信用的出现也导致了大量食利阶层的出现，进一步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而且，银行信用的滥用所带来的银行危机也会增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风险。^[24]

1.2.2.3 关于信用与虚拟资本的研究

洪银兴、葛扬（2011）详细地分类论述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是如何创造虚拟资本的。关于商业信用创造虚拟资本方面，他们依据马克思的论述，以汇票为例展开说明。汇票可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在资本家之间进行流通，导致汇票所象征的价值被反复计算，超过其所实际象征的价值，进而创造虚拟资本。银行信用创造虚拟资本方面，他们遵循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对虚拟资本产生的多种途径展开了论述。此外，他们还论述了信用形式上产生的虚拟经济的二重效应，认为信用扩张既有其正面

效应，也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25]李成勋（2018）认为虚拟资本是信用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推进着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就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形式，并能定期带来一定收入。此外，他还认为虚拟资本同借贷资本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借与贷的信用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信用关系。^[26]李云峰（2019）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认为虚拟资本的形式包括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

1.2.2.4 关于信用作用的研究

弓孟谦（1998）根据马克思对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作用的论述，对于信用的作用展开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他概括和解释了马克思的观点，指出信用可以促进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可以使流通费用得到节约，可以促进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进而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发展了资本主义。然而，信用在使资本主义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创造了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条件。^[27]与弓孟谦的论述类似，白暴力，白瑞雪（2009）也是建立在马克思对于信用作用论述的基础上，对于信用作用作出了归纳总结。他们认为信用可以促进流通费用的减少，可以促进股份公司的成立，同时也使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理由消失了，而且，他们也强调了信用制度所固有的两重性，一方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速度。^[28]王国刚（2020）则从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正面、负面效应出发论述了信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他认为信用经济具有节约了产业资本的资金和时间、推进了资本集中、推进了大型项目的建设、降低商品流通中的交易费用和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的正面效应。信用经济还具有加剧投机和欺诈等行为、将资本拜物教推到历史的新高度和增加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可能性的负面效应。^[29]

1.2.2.5 关于马克思信用理论对我国信用风险防范启示的研究

朱晓宁（2011）先论述我国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发展现状，而后根据这些现状问题给出建议对策。针对商业信用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改善商业信用离不开党政机关的支撑，企业自身应建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并且需要进一步推进企业征信系统和信用评级制的建设。针对银行信用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改善银行信用需要完善并严格执行银行业务规范，加大监管惩处力度，建立针对银行的信用评级制度和创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针对虚拟资本方面的问题，他认为需要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的持续性快速健康发展为基础和主体、同时适当发展虚拟经济，预防泡沫经济的出现。^[30]付军（2011）

从完善我国信用制度这一角度出发,从商业信用的基础性作用、银行信用的中介性作用,以及虚拟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双重影响方面给出建议。在商业信用方面,他认为要以经济利益原则为导向建设信用制度,同时要加强行业内部信用制度建设和规范信用中介服务。在银行信用方面,他认为要以资本配置效率为依据建设信用制度,同时要继续完善产权制度和建立银行信用风险调控机制。在虚拟资本方面,他认为要以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关系为参照建设信用制度,同时要强化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和及时调控新生虚拟经济形式。^[31]黄慧微(2020)则从传统信用形式和新型信用形式两个方面出发去论述商业信用的发展现状,并且指出在商业信用发展中还存在信用风险突出、流动性风险增强趋势明显和投机活动难以有效遏制等方面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防范意见。^[32]

1.2.3 对既有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

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克思对于信用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层面出发,也主要从经济层面对信用展开了界定,但也考虑了信用的道德内涵。他们从信用的形成、信用的形式、信用与虚拟资本和信用的作用等方面展开了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们大都关注到了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展开了对于信用风险防范的若干研究。很多学者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去研究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对于继续研究信用问题,推进经济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受到研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防范化解现实信用风险的研究还不是很完善。目前我国信用方面的建设还存在一些风险,这些风险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虚拟资本方面,而利用好马克思信用理论可有效缓解这些风险。许多学者对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资本方面的风险展开过论述并给出过防范对策,但是其中的大部分研究已经距离当前有些久远了,相关的防范对策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各方面信用风险防范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相对应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指导,利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最新生产要素和先进数字技术,探究我国信用风险防范对策的研究还不多,需要加强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来研究我国在上述方面的现状、风险和对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信用理论。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3.1 研究的思路

本文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研究和运用,深入分析我国信用风险的类型、现状及存在的原因。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信用风险,运用好马克思信用理论以及数字经济所能提供的数字技术等有利因素,给出各类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1.3.2 研究的方法

1.3.2.1 文献研究的方法

笔者重点研读了《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剩余价值理论》,以及有关“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国内外著作和期刊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比较、归纳总结出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为此项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还研读了大量关于信用风险管理的管理类文献和有关数字经济的经济类文献,为信用风险防范对策的探究打下理论基础。

1.3.2.2 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

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本文采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把握马克思信用理论、信用风险防范和数字经济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各类信用风险问题,指出马克思信用理论对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作用。

1.3.2.3 学科交叉的方法。

马克思信用理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对我国信用风险防范启示的研究涉及多门交叉学科,仅凭单门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因此,此项研究不仅需要运用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相关知识,还需要结合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知识,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研究进行分析、总结,达到研究目的。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1.4.1 研究的重点

本文研究的重点有三点:其一,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掌握马克思信用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关系。其二,通过对各类信用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找出我国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资本领域所存在的风险问题。其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运用

马克思信用理论和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技术赋能作用来分析和处理这些问题并由此提出具体的建议。

1.4.2 研究的难点

本文研究的难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研究的有关文献资料比较少，因此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较为困难。其二，对于我国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虚拟资本领域发展现状数据的搜集和归纳比较困难。此外，笔者由于专业能力的限制，很难实现数字经济研究的深入化。其三，论文涉及到多门交叉学科的研究，因此写作上要同时做到全盘考虑和重点突出还是较为困难的。

1.4.3 研究的创新点

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信用理论指导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缓解企业信用缺失问题和应对金融风险等当代价值方面的研究不在少数，关于数字经济背景下信用风险管理、防范的研究依然尚可，而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基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整理我国信用风险现状，探索防范对策的研究却相对缺乏。本文将立足马克思信用理论指导，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现状和防范对策，做到统筹兼顾，丰富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当代价值内容。

1.5 相关概念界定

1.5.1 “信用”的界定

“信用”一词具有精神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含义。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表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33]孔子认为“信用”比粮食和军备都要重要，信用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辞海》列出了“信用”的三层含义，分别为“以诚信任用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获得的信任”、“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34]。可见，孔子主要是从精神层面出发去理解“信用”的内涵，而《辞海》则是从精神和经济两个层面去理解“信用”。《牛津法律大辞典》将“信用”理解为“在作为回报而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时，并非立即进行偿付，而是允诺在将来进行偿付的作法。”^[35]这种理解不仅从经济层面出发，而且非常接近马克思关于“信用”的理解。

马克思在对“信用”进行界定之前，就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第一章中首先引入了“生息资本”的概念，因为此前学者对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资本家的经营只靠自有资本的假设上，然而这一假设却非常的不符合实际。不管是产业资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他们除了要使用自有的资本外，还不可避免的要用到一些借

入的资本，这才是真实的情况。资本家如果都只用自有资本进行生产和流通，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将受到极大的阻碍，自然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经济繁荣发展和危机周期出现的景象。马克思在第三卷第五篇之后引入现实存在的“借贷资本”、“生息资本”之后，对于“信用”问题的研究也就愈发显得必要。可以说，对于“生息资本”的研究就是对“信用”系统研究的先导。

在对“生息资本”的研究中，马克思用 A 代表货币资本家，用 B 代表职能资本家。他假设职能资本家 B 在用借入的生息资本完成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重新获得货币资本后立马将生息资本的原本加利息一次付给货币资本家 A，而不是暂留生息资本，只按期支付利息。马克思在此假设上给出生息资本运动的公式，即 $G—G—W—G'—G'$ 。G—G 表示货币资本家 A 把自有的货币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给职能资本家 B，这是这一运动的起点。W 代表着什么就要分情况论述了。当职能资本家 B 是产业资本家时，这一公式就可以细化为 $G—G—W < \frac{Pm}{A} \dots P \dots W'—G'—G'$ ，其中的 W 和 W' 不是同一物。 $W < \frac{Pm}{A} \dots P \dots W'$ 表示职能资本家 B 用从货币资本家 A 那里贷来的生息资本 G 购买商品生产所需的生产和劳动力，进行生产后得到的商品 W'。当职能资本家 B 是商业资本家时，这一公式就不用细化。W 表示商业资本家用贷来的货币资本购买商品后，不再进行再加工，而是直接用于加价出售。第一个 G' 表示职能资本家 B 把商品卖出后所取得的货币，这是货币资本的一种复归。职能资本家 B 不仅收回了用于商品生产所花销的借入资本 G，而且还得到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平均利润。第二个 G' 表示职能资本家 B 还给货币资本家 A 的货币资本和支付的一些利息。马克思用 ΔG 表示利息，所以 W 后面的第二个 G' 是作为 $G + \Delta G$ 回到了货币资本家 A 的手中。

从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的循环公式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公式，G—G 都是第一步，G'—G' 都是最后一步，中间的 $G—W < \frac{Pm}{A} \dots P \dots W'—G'$ 或者 $G—W—G'$ 才表示货币资本作为职能资本进行运动。货币资本家 A 在贷出货币资本时，并不考虑职能资本家 B 会如何使用这些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家 A 依然拥有这些货币资本的所有权，他只是通过让渡这些货币资本的使用权，从而在职能资本家 B 那里获得一定的利息。这些利息是货币资本家 A 从职能资本家 B 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那里再剥削而来的，所以货币资本家彻底地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分离出来了。对此，马克思表示，“在双方进行的交易中，中介过程消失了，看不见了，不直接包含在内了。”^[36]此外，他还总结道，“在

第一个作为先导的行为中，贷出者把他的资本交给借入者。在第二个作为补充的结束行为中，借入者把资本还给贷出者。如果我们只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易，——暂时撇开利息不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考察贷出的资本本身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这两种行为（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把它们分开，资本的现实再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就已经包括这个运动的全部。”^[37]所以，生息资本运动的公式还可简化为 $G—G'$ ，这是一种脱离职能资本运动形式的特殊运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让渡的这种特有形式的运动。”^[38]货币资本摇身一变为“可以自行增殖”的生息资本，好像自行增殖更多的货币就是它的自然本性。在此基础上，资本对于雇佣工人的剥削变得愈发的间接和隐秘了。生息资本的存在，使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发展到了历史顶峰。

货币资本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生息资本，除了受一些现实条件的影响，还离不开“信用”的支撑。马克思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信用”。在经济层面上，马克思认为“信用”就是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人们是为了获得各种经济利益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所以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还是要以经济为基础。在精神层面上，他认可图克对信用的理解，即“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39]。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发生借贷行为，就是因为他们心理上相互信任。马克思认为精神层面上的“信用”作为一种意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物质生产相互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1.5.2 “数字经济”的界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40]2021年，全球主要的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达38.1万亿美元，同2020年相比增加了5.1万亿美元，占到了GDP总量的45%。^[41]可见，数字经济领域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必争之地。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2022年就已经达到了50.2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41.5%，这一比重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相当。^[42]这表明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其重要性愈发明显。“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43]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然处于世界第一梯队。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将“数字经济”界定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44]在我国，数字经济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发展历史悠久，发展成果较为可观，这些成果皆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产业数字化中实体经济数字化的部分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而像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数字化的部分则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可见，数字经济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新型实体经济”。

第2章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历史生成是一个多层次的演进过程。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是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原因等生成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为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石。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过程则经历了萌芽、成熟和完善三个阶段并逐步构建起一个完整而深刻的信用理论体系。

2.1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条件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离不开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丰富的理论渊源和直接的现实原因。从其生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商品经济、商品货币关系以及高利贷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为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提供了土壤。从其生成的理论渊源来看，前人以及同时期学者的信用理论为马克思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共同构成了其信用理论的基础。从其生成的现实原因来看，现实社会中的信用问题也为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原因。

2.1.1 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颇为深远。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愈发紧密，为信用理论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高利贷资本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推动信用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为马克思深入探索信用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2.1.1.1 商品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信用并非在资本主义时期才存在，其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原始社会早期，为了应对来自自然的生产挑战，人类开始群居生活，并学会了使用工具，开展分工合作。人类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获取食物，然而，人与人获取食物的时间上存在差距，这时先获取食物的人就一定需要在某物的介入下，分享出自己的食物给予他人，才可以保证早期人类生存系统的稳定。信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并很好地缓解了原始社会早期食物获取上的时间差矛盾。但是，此时的信用仅仅只是依靠部落首领的威信支撑着，没有任何担保物作为担保，也没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易工具，仅仅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上。因此，这样的信用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部落首领威信减弱，或者遇到任何天灾人祸的冲击，信用的基础就将不再存在，分享食物的一方就将没有任何保障。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原始社会的人类除了食物，还可

获取和生产其他的物品，人类对于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生产能力的提升，使人类手中出现了闲置的物品，这时在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出现了物与物交换的情况，但是这种交换不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而且难以同时满足交易双方的要求，达成交易的难度也较大，所以很难实现推广。为了克服物与物交换的困境，某些被公认的可以交换所有物品的固定等价物开始出现，例如贝壳等稀有之物就被当做固定等价物使用。固定等价物的出现缓解了物与物交换困难的问题，使交换行为从对人的信任转化为对物的信任。

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进一步扩大，商品经济开始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固定物难以储藏和分割等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不再适用于人口数量增加以及商品贸易扩大化的需求。为了应对固定等价物的这些问题和满足不断扩大的交易需求，黄金等贵金属货币被人为赋予价值，作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而货币的出现又使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开始出现。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可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此时只需要观念上的货币，不需要现实的货币，而流通手段职能执行的交换媒介就必须是现实的货币。最开始的商品交易使用的都是足值的货币，但随着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有限的贵金属数量开始无法满足交易规模扩大的需要。鉴于此，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可以是不足值的，只要社会公认其代表一定价值即可。这些货币所代表的价值超过其实际价值的部分发挥的就是信用货币的作用，而“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45]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给货与付币不需要同时进行，此时货币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清偿债务。正是由于给货与付币存在时间差，所以就产生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债权人的授信可采取直接授信的形式，不需要第三方担保人。此外，债权人的授信还可采取有第三方担保的授信，即寻求银行或大型企业的担保，使用汇票和银行券等信用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货币支付手段职能发挥的范围愈发广泛，汇票和银行券等信用货币发展愈发迅猛，进而推进资本主义信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马克思信用问题研究的根基。

2.1.1.2 高利贷资本的产生和发展

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借贷资本的形式，而在资本主义以前则表现为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在原始社会末期，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已经出现，但规模较小且只集中于部分商品。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交换的发展推进着货币职能，尤其是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诞生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债务人为了到期

清偿债务，提高了对于高利贷资本的需求，促进了高利贷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这一时期高利贷者的贷款对象主要就是奴隶主和封建主，并从这些人那里获取利息。可见，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信用主要还是以高利贷的形式体现，当时“商人们不时要向高利贷者借款，相当一部分的商业利润落入高利贷者的腰包。”^[46]“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流动资本，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对货币的大量需求，高利贷越来越成为商业发展的障碍。”^[47]高利贷性质的信用制度与当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不匹配性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48]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克服了高利贷性质的信用制度后强势崛起。“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比高利贷性质的信用制度是一个质的进步，它的建立，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有力的信用支持，发展更加迅速。”^[49]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与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资本依然存在，只是贷款的对象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高利贷资本可以破坏封建所有制，加速封建经济的解体，但其本身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高利贷者的主要贷款对象就是奴隶主和封建主，目的就是获取高额利息。奴隶主和封建主为了在贷款到期时能够如期支付利息就必然加重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从而使小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变得更加贫困。部分奴隶主和封建主疲于应对高额利息的压力，使其也面临着贫困的风险，最后高利贷者往往会积累最多的资本。这些集中的货币资本往往主要被高利贷者拿来挥霍浪费，利用到商品生产、流通领域的货币资本反而变得越来越少。高利贷资本在导致大量小生产者破产，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信用制度发展的同时，其实现货币资本集中的事实又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进程。

2.1.2 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信用理论是在批判与继承古典学派以及同时期学者信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在其笔记和文章中摘录了许多西方学者关于信用的论述并给出了自己的评述。这些西方学者的信用理论给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借鉴，是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理论渊源。

2.1.2.1 关于信用的产生

英国古典学派代表人物威廉·配第和约翰·洛克将信用产生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是因

为货币分配的不均。洛克更是认为信用产生的原因与土地出租的原因类似。他认为“土地分配的这种不均等（你的土地多于你能够耕种或愿意耕种的，而另一个人的土地却少于他能够耕种或愿意耕种的）会为你招来一个租种你的土地的佃户；而货币分配的这种不均等……会为我招来一个借用我的货币的债户”，而且货币“通过相互协议，把作为一个人的劳动报酬的利润转入另一个人的口袋。”^[50]由此可见，洛克将借贷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不同人手中货币的多寡，掌握货币少的人会向货币多的人借用货币并支付利息，转出部分利润。洛克的这种肤浅观点并没有真正揭示借贷，也就是信用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相较于配第、洛克对于信用产生原因的肤浅认知，约瑟夫·马西关于信用产生原因的认知则更为准确一些。马西在其著作《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一文中批判了配第和洛克关于借贷产生的观点，而且尤其批判了洛克关于利息的观点。马西认为，借贷，也就是信用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货币分配不均导致的，而是由资本家货币资本出现闲置，以及其他开展生产的资本家需要这些闲置的货币资本的双向作用下产生的。诚然，马西关于信用产生的原因还存在诸多瑕疵，但是他的观点已经比较接近信用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为马克思关于信用产生理论的创建留下了借鉴意义。

2.1.2.2 关于信用的界定

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同时期的学者关于信用界定的认识可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一些人认为信用是对偿付能力的信任与承诺的兑现并以此建立的社会信心。大卫·休谟就认为国家债务就是民众对于国家偿付能力的信任，体现的是一种社会信用，而一旦国家的负债超过其偿付能力，将会出现失信的情况，打击社会信用，严重还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毁灭。本杰明·富兰克林则以纸币的性质为例，认为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因发行者的信用支撑着”^[51]这种信用正是民众对于发行者偿付能力信任的一种体现，只要这种信用还有公信力，凭借纸币开展的经济活动就能开展下去。约翰·穆勒则对于信用与信用形式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信用的基础是建立在信任上的，信用的使用会影响商品的价格。银行券、票据和支票作为信用的表现形式，并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的原因。^[52]也就是说，穆勒认为信用就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经济行为。

其二，另一些人认为信用是借贷过程中借贷财富、出借货币使用权的让渡，进而实现价值运动的形式。这类经济学家包括里昂·瓦尔拉斯、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等，他们对于信用的界定更倾向于银行信用学说。^[53]这类资本家立足于货币借贷业务，认为信用

就是资本家向另一资本家贷出货币，后者凭借这些货币开展经营活动并于借款期满还本付息的借贷运动。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借贷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以往那些关于信用就是信任与承诺兑现的观点逐渐不被重视，而将信用与借贷活动联系起来的观点开始变得突出。马克思吸收借鉴了这两类观点，分别从经济和精神层面对信用进行了界定。在这两层定义上，马克思也更重视经济层面的定义，并在《资本论》等经济文献中对其展开了详细、系统的论述。

2.1.2.3 关于信用的功能

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同时期的学者关于信用功能的认识不尽相同，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两种，分别为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信用媒介论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人。斯密是从银行信用的功能去认识信用的功能。银行信用具有提供廉价流通工具、扩大对外贸易以及推进工商业发展的功能^[54]，而这些功能主要又是由银行信用能够实现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提供更多的货币资本所带来的。他对信用媒介论的认识是建立在他对货币和资本认识上的。^[55]货币作为流通工具，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媒介的作用。银行信用可实现纸币代替金属货币，利用信用代替金属货币实现生产资料和商品的流通。在这个过程中，信用正是发挥着货币所具有的媒介功能。同斯密观点类似，李嘉图也是基于银行信用去论述信用的功能。他也认为信用只能发挥媒介作用，实现资本在资本家之间更加便利的流通，并不创造资本。与斯密仅论述信用媒介功能的积极作用不同，李嘉图还指出了信用媒介的消极作用并增加了信用媒介的国际性论述。

与信用媒介论不同，信用创造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信用可以创造资本，其主要代表有约翰·劳、亨利·桑顿、麦克劳德等人。约翰·劳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越多，就越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工商业发展和增加国民财富，然而金属货币存在数量有限、携带不方便和容易丧失分量的缺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主张通过银行发行的纸币等信用货币代替金属货币的流通，这样就能很好的避免金属货币流通的缺陷，增加国家货币数量，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约翰·劳关于信用货币及其作用的观点表明其认为信用就是货币，银行提供信用就是提供货币，而货币的增加又会创造资本和增加财富，即信用可以创造资本。桑顿认为商业交易和银行信用会促使商业票据和银行券的产生，而“增发的银行券却可为生产者提供购买力，以使其获得较多的既存商品，以从事新的生产。”^[56]当银行券等信用券增加，而商品对银行券的需求增加时，就会导致物价上涨，

生产扩大，消费受限，导致作为资本的商品增加。^[57]与约翰·劳的观点类似，麦克劳德也认为信用就是货币且信用作为生产资本可带来利润。麦克劳德关于信用创造功能的论述依然是从银行的作用着手，认为银行创造着信用，并进而创造着资本。^[58]

马克思批判吸收了这两类信用功能理论并更认可信用创造理论。他创造性的提出了信用作用的双重性，一方面，信用可节省各种流通费用，加速股份公司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会创造虚拟资本，加重投机风险和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2.1.2.4 关于信用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关于信用与危机关系的认识，李嘉图学派的认识较为典型。李嘉图学派鉴于历次经济危机发生前，信用都出现了紧缩的情况为依据，认为信用就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此外，这一学派还认为在信用紧缩的情况下，资本数量会出现明显不足的情况。基于以上观点，他们认为调节好信用就可预防经济危机。针对这种将信用视为经济危机爆发原因的观点，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这类学者肤浅的将“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59]马克思认为信用的紧缩只是生产周期更替的征兆和正常现象，对经济危机的爆发只发挥推动作用，企图混淆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淡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危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马克思还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资本不仅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反而还会存在大量的闲置。信用促进了银行的出现和维持了银行的运行，创造了虚拟资本，助长了投机行为。信用的这些消极作用，在经济虚假繁荣和过度萧条的时候会协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

2.1.3 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现实原因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由工场手工业转向大机器生产的转变，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业革命已经取得很大发展，工业生产力取得极大提高，工业商品交易活动频繁，商业活动景象繁荣。在协助商业行为的过程中，银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也随之推动着信用活动的迅猛发展。然而，信用的过度扩张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进而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信用理论正是为了探究和应对这些现实问题而创立的。

2.1.3.1 信用投机活动频发

信用较早是以商业信用的形式存在着，这种信用形式早在简单商品生产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工业革命，取得巨大发展后，商业信用才开始在

资本主义市场蔓延开来并成为加速资本流通的主要手段。商业信用在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助长投机行为，导致投机活动频发。信用投机行为会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而这种扩大趋势又往往与劳动人民有限的支付能力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商品开始滞销，企业出现倒闭现象，经济危机蓄势待发。

商业信用加速资本流通的局限性推进了银行信用的出现，而银行信用的出现则使信用投机问题变得愈发严重。银行家利用银行信用可攫取大量社会财富去进行投机，职能资本家也可利用银行信用展开投机。

在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生产非常繁华，许多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为了在铁路股票上进行投机，就用他们的商品向银行作抵押，取得大量的贷款，以此认购大量的铁路股票，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减少使大量投机企业不同程度的缩小了营业规模。与此同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由于资本不足，于是不得不采取向银行票据贴现的办法来维持企业的运转，企业利益由此受到损失，当下一批认购股票的付款期限到来时，这些资本家又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导致企业利益再次蒙受损失。^[60]除了用现有商品作抵押去获得贷款并进行投机外，职能资本家还会将委托销售过程中的提单作为抵押获得贷款，或者在商品起运前，甚至制造以前就进行抵押来获得贷款，进行投机。^[61]由此可见，当时的银行信用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也助长了投机行为，并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虚拟资本已经初具规模。虚拟资本的出现扩大了实体经济融资的渠道，提高了融资的便利性，但是，虚拟资本融资的便利性也容易导致投机行为的盛行和资源配置的扭曲。正是由于虚拟资本的价格会出现暴涨和暴跌的情况，进行信用投机的资本家出于对有价值证券预期收益的期待，他们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有价值证券中进行投机，从而导致大量的社会资金滞留在证券交易领域，减少了本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产业资本数量，扭曲了资源配置，挫伤了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诚然，当时虚拟资本的出现和发展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2.1.3.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频繁

在马克思所处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837 年，由于银行信用贷款的过度扩张和土地投机的狂热发展，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当时，大量银行宣布破产，信用遭受严重打击，市场活动停滞，失业率上升。1847 年，欧洲各国银

行基于银行信用建立的信贷链断裂，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工厂停业，员工失业，并引发经济危机。1857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其他国家，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铁路和土地市场的泡沫破裂所引发的，导致大量公司破产，经济衰退明显。

这些经济危机的爆发与信用的过度扩张关系紧密，体现了资本主义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不稳定因素。当时，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给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始采取措施来稳定金融系统、改善劳工条件和保障市场交易。与此同时，很多西方学者也开始探究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其应对措施。其中，以李嘉图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最为典型。这一学派错误的将经济危机爆发的加速器——信用，视为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亲身经历的经济危机，以及部分西方学者将信用视为经济危机爆发原因的错误认知，促使他深入研究了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信用的消极作用只是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不是引发危机的原因。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依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2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过程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过程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涉及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深入研究和对经济运行规律的透彻把握。这个生成过程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马克思信用理论的萌芽、成熟和完善阶段。

2.2.1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萌芽

1844年初，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信用问题。此时，信用还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马克思还只是将信用作为一个附属性问题进行研究，而且其对信用的研究也只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依据。马克思曾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论交换部分就信用的批判展开了一段论述。马克思表示，在信用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62]马克思很明确的表示，“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63]而且，这种人的异化关系不仅没有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复归，而且还导致人的自我异化变得更加的极端化。那些过度理想化借贷双方信贷关系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例如国民经济学派认为“一个富人贷款给一个他认为是勤劳和有信用的穷人”^[64]这个观点就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穷人的全部社会美德，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他的存在本身，在富

人看来也都是偿还他的资本连同普通利息的保证。”^[65]在借贷关系中，用货币的偿还能力来作为借贷与否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使人的异化更加极端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1845年，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曼彻斯顿图书馆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摘录了吉尔巴特、库伯和布郎宁等人的观点时又在伦理层面研究了信用问题。可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于信用的研究主要还是从伦理角度出发的。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从经济学的层面展开，并将其与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分别摘录了亚当·斯密、西斯蒙第、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威廉·配第等人关于信用的论述。这些学者关于信用的论述涉及了信用的产生和发展；信用的基本形式；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以及银行信用对商业信用的取代趋势；信用可实现持有闲置资本的资本家与从事生产活动资本家之间资本的流动，提高货币资本的流动性，实现生产的扩大；信用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对于这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其日后信用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作了理论上和材料上的准备。

2.2.2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成熟

1857年8—9月间，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开头部分，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了一篇总的导言。在“导言”中，马克思为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而制定了一个“五篇计划”。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将信用划分为“私人信用”和“公共信用”，并分别安排在“计划”的第二篇和第三篇中进行研究。由此，信用问题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被划分了出来，为马克思信用理论最终走向成熟奠定了方向上的基础。

1859年，马克思虽然在其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第二章开篇就表示，“我们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66]但是其依然零星地部分论述了部分关于信用的观点。马克思就曾论述过信用对于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价格增加速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信用活跃的时期，货币流通的速度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品价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67]马克思还表示，由于各种商品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使得卖者出现的时候，买者由于其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购买卖者的产品，于是买和卖的行为分离开来，买卖双方的关系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虽然是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但是可以在信用制度存在之前就十分发达”

[68]。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将缩小其购买手段和储藏手段的应用范围,进而被更加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和《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中,马克思对于信用问题都有一定的论述,但这些论述大多仅作为资本生产和流通等研究的附属研究,即此时信用仅作为其他研究的研究工具存在。马克思的这些关于信用问题的论述,虽然还没有把信用正式地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但是这些论述为日后他的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意味着马克思关于信用的研究彻底集中到经济学角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信用”基本等同于“信贷”使用,他认为“信用”其实就是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而且认为“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69]随着信用事业的进一步扩大,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被应用得更加广泛,从而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扩大了信用货币的规模,使信用货币逐渐发展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展开了对公共信用和国际信用的论述。公共信用实际就是国债制度,是“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70]公共信用可使闲置的货币转变为资本,而货币所有者将凭借货币资本获得额外收入,并且不用承担投资亏损和高利贷不可收回的风险。公共信用的这种特点诞生了一批食利者阶级,他们利用公共信用的便利大发横财,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公共信用还会加重各种投机行为和提升现代银行的统治力。与公共信用一样,国际信用也是“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71]由此可见,信用提高了闲置货币的流动性,使闲置货币流入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手中,给货币所有者带来额外收入的同时,也为货币使用者创造更多的资本。马克思信用理论随着《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第一卷关于信用理论的系统论述还是较少,还需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2.2.3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完善

1883年,马克思逝世,其遗作——《资本论》第二卷和三卷后经恩格斯汇总整理才得以先后问世。1885年,随着《资本论》第二卷的问世,马克思信用理论取得了进一步的完善。马克思在这一卷提及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并认为这两种信用形式是信用的主要形式,这一观点为第三卷关于信用问题的系统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信用货币主要可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但由于该卷的研究依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所以“还是撇开信用货币不说”[72],重点研究金属货币。此外,马克思在这一卷中初次

论及到信用经济。他认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73]，同时，他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达阶段，信用经济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货币经济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

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的问世意味着马克思信用理论实现了系统性的完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之前的内容中，在不考虑借贷关系等信用问题的基础上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形成了相关的系统性理论。在第三卷的第五篇中，马克思首次将信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对信用及其一系列衍生问题展开了系统性的论述。在该篇中，马克思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对信用作出了界定，并以经济层面的界定为主展开后续的一系列论述。关于信用的形式，马克思“只谈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74]马克思按照出现的顺序，先后对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尤其重视对于银行信用、银行及银行资本的论述。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不断扩张及收入资本化的背景下，虚拟资本被创造了出来并且其发展规模与日俱增。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述了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问题，使货币流通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信用的过度扩张和膨胀的虚拟资本，加重了资本主义市场的信用投机风险，进而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关于信用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幼稚走向成熟，再走向完善的过程。马克思最初仅将信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依据，仅作为一个附属性问题进行研究。随着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深入，以及当时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更加认识到信用的重要性。随着其关于现实的信用发展资料的收集、整合、分析工作的落实，马克思逐渐将信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并整合以往信用研究的成果，形成马克思信用理论。

第3章 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内容体系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经济学家信用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信用理论。马克思关于信用的论述虽然遍布于其大量的文章中，但主要还是集中于《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整合了以往信用研究的一些成果，实现了对信用问题系统和完整的研究。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内容体系完整，论述较为严谨。信用形式的界定为信用问题尤其为虚拟资本如何形成的论述奠定了概念范畴基础，并为信用扩张以及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论述提供了信用工具和应用场景，进而完善了货币流通理论。马克思在以上信用问题系统性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信用的繁荣发展，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消极作用的观点。

3.1 信用的形式

在马克思引入“生息资本”概念并且给出了“信用”的界定后，他对生息资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资本主义信用的阶段，这一阶段正式进入生息资本运动的实际形式研究阶段。这一阶段资本主义信用的研究主要围绕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展开。

3.1.1 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时期才有的，其实早在简单商品生产时期就已经有了商业信用。在简单商品生产时期，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为了尽快完成商品的买卖，从而不阻碍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加之货币具有支付手段的职能，所以他们之间会以普通商品作为对象发生相互赊欠账务的情况，从而导致商品之间的买卖变成了一种借贷行为，但是由于当时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都不像资本主义时期那么发达，商品的生产也局限于一定的种类和地区，所以这种借贷行为并不多见。可见，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的商业信用范围较小，在当时并不普遍。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已经发展到了很发达的程度。但是，当时商业信用的发展水平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这个时候，商业信用必须要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才可以。由于社会分工，社会上负责不同生产部分的企业和部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之间关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往往互为联系。社会上能够单独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少，社会的生产已经逐渐地连为一个整体。但是，各个生产企业和部门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时间各不相同。当某些资本家

想要销售他们生产的商品的时候，另外一些想要购买这些商品的资本家很可能由于自己生产的商品还没有出售，暂时没有回流的资金去购买这些出卖的商品，此时，卖方如果还固执地要求买方必须用现款进行支付，那么买卖双方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这一影响将严重地阻碍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卖方只有用赊销的方式将商品卖给买方，才不会阻碍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才不会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产业资本家之间在商品买卖上提供信用的情况。除了产业资本家之间在商品买卖上互相提供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也会提供信用。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市场上的商品买卖行为往往会横跨好几个区域。这时，由于距离较远，商业资本家往往无法承担把产业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全部买下来，再运到市场去出售的费用。这个时候，产业资本家就需要把商品暂时赊销给商业资本家，等商业资本家出售商品，有了回流的货币资本后就可以取得这笔费用。这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提供的信用。

从上文可以看出，“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75]，即职能资本家之间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赊销商品的行为，此时的商品让渡与价值实现分离开来，商品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此外，马克思还指出，正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这种授予商业信用的行为，使职能资本家经常既扮演债权人的身份，又扮演债务人的身份。这些职能资本家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融入到整个产业链中，他们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马克思认为这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76]，利用这层关系，机遇和危机都可实现快速的蔓延。在这条商业信用链中，商业信用可作用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全过程。在商品生产阶段，相关原材料甚至劳动力的取得都可通过商业信用实现；在商品流通阶段，商业信用可以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缓解了企业货币资金不足的压力，增加了交易达成，从而扩大经营规模的可能性。但是，一旦债务人经营出现问题，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就将面临货币无法回流或者延迟回流的局面，这条信用链就会出现断裂并可能蔓延到整个信用链。所以，“商业信用是资本主义信用的基础，它是直接为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服务的，或者讲它是由保持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直接派生出来的。”^[77]

商业信用既可采取直接授信的方式实现，也可以商业票据等商业货币工具实现。对于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商业货币问题，马克思说：“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证概括为票据这个总的范畴。”^[78]马克思的这句话具

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总结了商业信用基础上商品买卖的特殊表现形式，同时也指出了商业信用基础上的商业货币就是商业票据这个事实。商业票据分为期票和汇票两种。期票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出的一张承诺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支付现款的债务凭证。汇票则是债权人向债务人开出的令其在一定时期内付款的债权凭证。除此之外，期票和汇票都允许通过背书的方式转让给第三方。商业票据作为商业信用的工具，它可以降低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现金使用频率，这样职能资本家之间就不会因为暂时现金的亏缺而阻碍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进程。商业票据的使用加速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进程，加速了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从而节省了货币流通的费用。

商业信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虽然商业信用的作用非常突出，但是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商业信用不仅会受到商品流转方向的限制，而且商业信用的量还会受到职能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量的限制。当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可以一直运转下去的时候，资本回流就有保证，而且这种回流后的资本大概率会多于回流前的资本。这就可以保证这种商业信用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而且这种扩大是以再生产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出现延迟或者中断，职能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就会出现商品滞销和固定资产闲置的情况。此时，职能资本家会降低对于商业信用的需求度，因为职能资本家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货币去购进商品或者生产资料。如果职能资本家突破这些限制去开展投机和扩张活动，就可能加剧生产过剩，从而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商业信用使商品让渡与价值实现分离开来，在促进商品交易达成的同时，也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行为往往会变得愈发猖獗，职能资本家也往往会陷入过度扩张的风险之中。

3.1.2 银行信用

商业信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体现的只是职能资本家之间的信用，只能以商品资本的形式提供出来。作为商业信用工具的商业票据也只能作为支付手段在一定范围内流通。为了克服商业信用的这些缺陷，一种新的信用形式——银行信用应运而生。

银行信用的产生是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货币经营业主要从事与货币流通有关的技术操作类业务，如货币的汇兑、保管、支付、结算等业务。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的货币经营业逐渐不能适应市场对于借贷资本的大量需求，于是，货币经营业开始涉足货币的借贷业务。货币经营业与货币的借贷业务结合后，逐渐地发展成为现代的银行业，此时的货币经营资本就发展成为银行资本，借贷货币资本

也就发展成为银行信用，银行成为了货币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

银行可以用来放贷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如下几个途径流入银行的。第一，银行家将自有资本投入银行。第二，职能资本家将其暂时闲置不用的货币资本投入银行。第三，货币资本家以取得利息的目的而存入银行作为存款的货币资本，或者一些无法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小额货币集中存入银行。这些货币积少成多，汇集而成货币资本，从而可以发挥货币资本的借贷作用。第四，像工人的工资，或者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费用也会出于信用而存入银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的货币资本和收入最终都会以各种方式流入银行，成为银行进行借贷所用的货币资本。

银行在取得了大量的可以用来借贷的货币资本后，它会采用票据贴现、直接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购买公司股票或者存款透支的方式开展贷出业务，这其实就是银行信用的体现。马克思重点讲了“票据贴现”。票据贴现是指银行在扣除相关贴现费用后，用现款或者银行券购买未到期的票据，此时支付的现款或者银行券的金额是少于票据上所注明的金额的。由于票据的债权人已经将票据卖给了银行，所以银行现在成为了债务人新的债权人，债务人要在票据到期后向银行支付现款。这种行为实际就变为了银行对债务人进行借贷，债务人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借贷行为，在此基础上，票据贴现也就变成了银行向职能资本家提供短期贷款的一种形式。这里的银行券是指“向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79]直接信用贷款指银行只依靠个人信用就向其贷款。这一信用得益于职能资本家将其暂时闲置不用的货币资本投入银行这一行为。职能资本家的这一行为，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利息，而是为了更容易地取得银行信用，也就是取得银行的贷款。当职能资本家存入银行的货币资本足够多后，银行就会认定这类职能资本家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风险，也就更加愿意提供银行信用给这类职能资本家。抵押贷款主要就是银行提供给那些不够信任的职能资本家的一种贷款形式。这类职能资本家为了获得贷款就必须抵押自己的其他资产，对此，马克思表示这种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80]。除了以上方式获得贷款，职能资本家还可以通过抵押房地产而获得贷款。银行购买公司股票，表面看是银行进行的一次权益性投资，但实质上还是银行向职能资本家提供的一种间接性的贷款，只是这种贷款能否取得利息并不取决于时间的流逝，而是取决于所投公司的盈利情况。存款透支是指银行对于确信有偿还能力的人，允许其取得超过自己存款数量的货币。

银行在取得大量可以用来借贷的货币资本，并且采用各种方式开展贷出业务、提供银行信用后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利润。简单地说，欲取得利润，银行借入货币资本或者小额货币后给借款人的利息率要低于他们贷给职能资本家时所要求的利息率。这一差额还要扣除像银行员工工资、各种设备折旧、损耗等各种费用后，才是银行真正取得的利润。这一利润并不是银行中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它依然还是靠剥削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取得的。银行中的劳动者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只有雇佣工人的劳动才可以创造剩余价值。银行通过向职能资本家提供借贷资本，从而获得职能资本家从雇佣工人那里剥削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剩余价值就是职能资本家付给银行的利息，此时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就被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了。银行中的劳动者并不能取得全部分割来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中的绝大多数要被银行家进行一次再剥削，这样，银行家既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甚至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剥削劳动就剥削到了大量的剩余价值。银行家不仅剥削生产中的劳动者，而且还剥削银行中的劳动者。银行家的这一行为，剩余价值被反复剥削的这一现象，也就为后面的各种投机所导致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银行信用克服了商业信用在量上受到职能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商品流转方向限制的缺陷。它扩大了资本主义信用的范围，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需要，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银行信用的出现，也让投机行为变得更加的方便和猖獗，这也就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矛盾。

3.2 信用与虚拟资本

在马克思论述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两个信用的形式后，他提出了“虚拟资本”这一概念，并且在“银行资本”部分对“虚拟资本”的形成过程展开了详细论述。“所谓‘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它是与现实资本相对而言的想象中的资本。”^[81]马克思从物质形态和资本来源两个方面来论述银行资本的组成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他认为银行资本可分为现金和有价证券两大类。现金可分为金和有黄金作保证的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可分为银行券、公共有价证券和商业票据，其中公共有价证券可分为国债和公司股票，商业票据分为已经被职能资本家贴现从而保存在银行的期票和汇票。从资本来源来看，银行资本又可分为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其中自有资本多以银行准备金的形态存在，而借入资本则多是其他各种来源的存款。

3.2.1 信用形式创造虚拟资本

3.2.1.1 商业信用创造虚拟资本

职能资本家之间在进行商品或者生产资料的交易时，往往会出现因为一方缺少现款而开出期票和汇票等商业票据的情况，此时的职能资本家之间提供了商业信用。流通于职能资本家之间的期票和汇票，由于它们没有进入到银行中，所以不是银行资本的一部分，也不会因为存入银行而大概率被当做生息资本使用而“资本化”。只要这些商业票据不被多次背书转让，让其价值得到“增殖”，它就不会“资本化”。它只是一个像货币一样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票据。但是，商业票据在到期前都可以背书转让给其他人，此时它在流通过程中可以像货币一样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正是由于商业票据的这一特征，商业票据在流通过程中会多次被背书转让，这样就会导致它在流通中的价值额远大于它实际代表的价值额，此时它的价值得到了“增殖”，这些商业票据就“资本化了”，但这些资本都是虚假的。以上可以看出，在商业信用的背景下，通过商业票据的多次背书转让这一流通手段就创造了虚拟资本。

3.2.1.2 银行信用创造虚拟资本

在银行资本中，由于现代商业银行主要就是为了从事货币的借贷业务而存在的，所以银行资本大多是以生息资本的形态存在着，这些资本大都被“资本化了”。

银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创造虚拟资本。其一，银行通过直接发行没有黄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创造虚拟资本。银行券不仅是以商业银行为基础，而且它还要保证能与黄金进行兑换。只有以黄金作保证并能与黄金进行兑换的银行券，才能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而那些没有黄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就不是现实的资本，而是虚拟资本。

其二，银行通过为职能资本家贴现商业票据的方式创造虚拟资本。职能资本家在遇到急需现款但商业票据还未到期的情况时，就会将商业票据拿到银行进行贴现，以牺牲一定时间价值的方式而尽快地获得现款。此时的银行得到了商业票据，它还会对商业票据进行多次的贷出、买进，从而导致商业票据所代表的价值被重复计算，最后远大于它实际代表的价值。这些商业票据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还不是虚拟资本，但一旦这些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商业票据进行流通、被重复计算后，它们就被“资本化”并且变成虚拟资本。

其三，银行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创造虚拟资本。存款是银行借入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远远多于银行的自有资本。马克思在论述银行吸收存款后是如

何创造虚拟资本的时候，引用了《通货论》中的一段论述。这段论述是：“今天你在 A 那里存入的 1000 镑，明天又会被付出，在 B 那里存入。后天又由 B 付出，在 C 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 1000 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倍增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82]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银行吸收的存款在经过了多次的存了又贷、贷了又存后，此时的银行存款的数量要远多于现实存入的现金数量。现实存入的现金多次充当存款的工具、多次发挥货币资本所具有的借贷职能，此时的信用货币代替了真实的货币、信用流通代替了货币流通。因此，这部分的存款就纯粹是虚拟和幻想的，此时的存款就已经变成了虚拟资本。

其四，银行自有资本的准备金，大部分也是虚拟资本。如果银行想要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家就要先投入自有资本，只有拥有雄厚自有资本的银行才会得到存款人的信任。在对 1892 年 11 月伦敦最大的 15 家银行的准备金公报进行研究后，恩格斯在脚注中表示：“在这大约 2800 万镑的准备金中，至少有 2500 万镑存入英格兰银行，至多有 300 万镑现金存放在这 15 家银行自己的保险箱内。但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现金准备，在 1892 年同一个 11 月内，一直不满 1600 万镑！”^[83]从这里可以看出，这 15 家银行会将自己的准备金存入英格兰银行，这就表示银行之间也会提供银行信用。这些银行之间会因为提供了银行信用而选择互相信任，此时的存款者也会因为这些“虚高”的银行准备金而选择相信银行，从而存入更多的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理应用现实资本充实的银行准备金也被“注水”，它们大多只是存在于银行的账面上，因此也是幻想的、虚拟的。

3.2.2 收入资本化创造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除了可以在信用形式上产生，还可以通过收入资本化的形式产生。那么，收入资本化是什么含义？虚拟资本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呢？

生息资本是可以带来周期性货币收入即利息的资本。正是由于生息资本的这一特性，虚拟资本的产生才有了基础。一方面，“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84]另一方面，“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85]例如，一张票面价值是 1000 镑的股票，年股息率是 10%，那么这张股票一年可以获得 100 镑的股息。虽然这 100 镑的货币收入是根据年股息率算出来的，但是这一货币收入还是要转化为利息性质的收入，此时就要根据年利

息率倒推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假定当时银行的年利息率是 5%，那么这张股票的价格就 $=100/5\%=2000$ 镑，此时的 2000 镑就表示是产生 100 镑货币收入的资本。虽然这张股票的票面价值只有 1000 镑，但是它的出卖价格已经变成了 2000 镑。这 2000 镑纯粹就是虚拟的，此时的股票就已经是虚拟资本了。

当货币资本被当做借贷资本贷出，此时的货币资本就已经转变为了生息资本。生息资本这一可以带来利息的资本实际是货币的一种“资本化”过程，当每一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被当做是某一资本的利息时，此时生出这一货币收入的不管是不是资本，都把它当做资本，与此对应的货币收入也就转变为了资本，这就是收入的资本化过程。在收入资本化的基础上，很多不是资本的东西都被当做了资本，虚拟资本也就应运而生。

收入资本化基础上产生的虚拟资本有两个典型形式：一是国债。国债是国家借入债务的时候给债权人的债权凭证，债权人通过债权凭证可以每年从国家那里取得一些利息。国债为什么是虚拟资本？首先，通过上面关于股票的例子可以同理推出，国债的市场价格也可能会高于其券面价值，这一现象是在收入资本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次，债权人买了国债后，他中途不能直接要求解除契约，只能通过转让国债而间接实现解除契约的目的。国家在取得发行国债的货币收入时，并不将其作为资本进行支出，而是将其用于非生产性的开支，此时国债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其实已经被“消灭了”，而债权人握在手中的国债其实只是“被消灭了”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债权人之所以还能靠这一虚假的资本从国家那里取得利息，这完全是靠国家的信用支撑着，一旦这一信用崩塌，国债就会瞬间变为废纸。因为国债可以带来利息，所以其“资本化”了；因为国债只是代表“被消灭了”的现实资本，所以它是虚假的，综上，国债是在收入资本化的形式上产生的虚拟资本。

二是股票。股票是指股权人进行投资入股的股权凭证，股权人可以凭借它定期取得股息。和国债一样，股权人一般也不能要求退股，他也只能通过到股票交易市场去转让股票这样的间接方式达到目的。但是，与国债不同的是，公司通过股票方式取得的货币收入并不是用于非生产性的开支，而是作为生产用的资本进行开支的。股票所代表的现实资本并没有被直接“消灭掉”，而是以其他的形态存在着，此时的股票还是代表着现实资本。但是它也仅仅只是代表现实资本，只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现实资本存在于企业中，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股票的买卖并不会影响到现实资本的运动。所以马克思才会表示，股票“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

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86]由此可以看出，股票只能代表现实资本，而不能成为现实资本，它只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上文列举的关于股票的例子可以形象的解释这句话。例子中股票的票面价值是 1000 镑，股票的买卖价格是 2000 镑，此时股票的票面价值 1000 镑就是股票所代表的现实资本，股票的买卖价格 2000 镑就是一个虚拟资本。

从上文对于虚拟资本价格计算的例子可以看出，虚拟资本的价格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一方面，它取决于它有权获得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另一方面，它又取决于银行利息率，并与前者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87]虚拟资本的价格会随着有权获得的收益和利息率的变化而发生暴涨和暴跌的情况，正是由于虚拟资本价格的这种独特的决定方法，使它天生的就具有很大的投机性。资本家会针对虚拟资本的这一特性进行投机，当投机过度的时候就会形成巨大的财富泡沫，这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一旦危机爆发，这一膨胀的财富泡沫就会迅速破灭。

3.3 信用与货币流通

《资本论》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部分就已经对货币流通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但这些论述都是在不考虑信用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形成必然会对货币流通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论述完信用的界定、形式和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关系后，就要进一步论述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问题。引入信用因素，货币流通理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完整了，在此基础上，这一理论也迎来了它的完成形态。

3.3.1 信用与国内货币流通

3.3.1.1 信用节省了流通中的货币量

贵金属是一种难以再生和数量有限的昂贵货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货币的需求量会大大地增加，这个时候，如果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都需要切实地使用这一货币，那么这些货币的供应量将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这将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信用的介入，达到节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目的，从而解决货币量不足的问题。“信用的发展力图使流通过程摆脱现有金属货币量的限制，从而扩大流通范围，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创造新的运动机制。”^[88]

信用是从三个方面节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一方面，由于大部分的商业行为都是在信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加上货币很多时候是作为支付手段来执行职能的，从而产

生了像期票和汇票这样的商业票据，商业信用在此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商业信用的工具——商业票据可以通过背书的方式，像货币一样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在使用商业票据代替货币行使职能时，商业票据所代表的互相之间的债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抵消从而节省现实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当“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转到另一个户头”^[89]，也就是说，当债务双方在同一个银行都有开户，那么他们之间的债务只需要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结清。当“由不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90]像这样需要在不同银行之间进行结算的情况则需要在票据交易所里进行。在这一系列的转账抵消行为后，只剩下的一些零星差额才需要用货币进行支付。

另一方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完全取决于买卖的顺畅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会作为中介促进并从而提高流通速度。”^[91]也就是说，流通速度的快慢不仅取决于商品买卖的顺畅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信用是否会介入。商品买卖越顺畅，货币的流通速度就越快，而信用的介入又会使货币的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就越能节省流通中的货币量。这是因为，一方面，银行可以提供一些如转账、划拨等技术性业务，这样的话，很多账款就会直接在银行账户上被互相抵消掉，只有少数差额部分才需要用货币支付，这样就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在信用制度下，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商品买卖并不一定要通过金属货币才能开展。信用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金属货币而发挥职能，这样，职能资本家之间就不会因为一方缺少现款而无法达成交易。信用可以加速商品形态的转变，从而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并进一步节省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最后一方面，银行成立后，它通过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大量收集职能资本家或者其他人的货币，让这些货币以存款的方式存放在银行里。银行在取得存款后，它还会用以这些存款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来进行票据贴现，成为债务人的新债权人。在票据到期后，银行又可以收集到一些货币。通过吸收存款和进行票据贴现的方式，银行减少了货币停留在私人手中的时间。银行可以对这些货币进行更加有效的利用，这样可以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节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3.3.1.2 信用节省了流通中的银行券

信用不仅节省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且还可以通过创造新的流通手段——银行券来代替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

银行券通常是在进行票据贴现时发行的一种信用货币，债权人可以用它到银行兑换货币。银行券能够像纸币一样地进行流通，它可以作为一种流通和支付的工具。除了可以兑换的银行券以外，还有一类银行券是不能兑换货币的银行券，它们是没有黄金作保证的银行券。这种银行券就是纯粹靠国家信用才可以像货币一样进行流通，它们就是虚拟资本。本文以可兑换的银行券为考察重点。

马克思在对产业资本货币流通理论进行论述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92]也就是说，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还未销售的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中所需要的银行券的数量遵从这一规律吗？马克思表示：“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93]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未销售的商品价格总额增加时，此时市面上被开出的商业票据和要求银行贴现的商业票据数量都会增加，此时，银行也要相应地多发行一些银行券；反之，银行就会减少银行券的发行数量。因为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黄金，所以银行就绝不能随意增加市面上银行券的数量。流通领域中的每一张多余银行券都会被持有人以向银行兑换黄金的方式流回银行。

流通中所需要的银行券的数量不仅受未销售的商品价格总额的影响，而且还受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由于信用的影响，各种额度的银行券在交易过程中被转账抵消的情况增多，从而节约了支付方式，促使流通速度加快。当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时，同样的时间里，停留在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就会减少，这样就可以节省流通中所需要的银行券。

3.3.2 信用与国际货币流通

在世界市场上只有贵金属才能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所以要研究世界市场上的信用和货币流通的关系问题就一定要研究贵金属，也就是要研究信用与贵金属的国际流动问题。由于贵金属在各国之间的流进和流出的运动要受汇兑率的影响，所以还要研究贵金属国际流动的汇兑率问题。

3.3.2.1 贵金属国际流动的几个要点

关于贵金属的国际流动问题，马克思列举了九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马克思的这些阐述可以归纳为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贵金属国际流动的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分别为“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

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94]。贵金属从产地流入不生产贵金属的國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输入国为了补偿自己國家的货币在流通中的损耗；二是输入国为了满足对于奢侈品消费的需要；三是输入国为了增加本國的贵金属贮备量，以备日后国际输出所用。贵金属在不生产它的國家间进进出出的流动着，它们中的大部分会在流通中相互抵消，“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95]人们根据“占优势的”一方，即差额的方向确定贵金属到底是流出还是流入，并认为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情况和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情况是一致的。虽然“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96]，但是，贵金属的流通还可能“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对比关系的表现。”^[97]例如，国际间不涉及商品买卖的投资行为，这也会引起贵金属的流出，但是却和商品买卖无关。

第二个要点：贵金属国际流动的支付差额。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98]这一现象是由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不同所决定的。支付差额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进行商品交易后必须要用货币偿付的贸易差额，而且还包括其他的单纯收支情况。这就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从贸易差额看是顺差，但是从支付差额看却是逆差。在马克思所在的时期，资本主义國家就已经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强行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并且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输送自己的商品，此时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國家在商品贸易上是顺差的情况。但又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國家为了自己的殖民掠夺变得更加的方便，还向亚洲國家进行了很多的投资。当时的贸易顺差额减去这一投资额，得到的数额很可能就是一个负数，此时资本主义國家在支付差额上看起来就是逆差，因此，当时的支付差额对于亚洲来说是顺差，而对于欧洲和美洲等资本主义國家来说又是逆差。

第三个要点：贵金属的国际流动和中央银行金贮备的关系。

首先，贵金属的国际流动“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99]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金贮备的增加或者减少可以作为衡量贵金属在国际间流入或者流出的尺度。但这一尺度的准确程度还取决于全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一般情况下，银行业的集中程度越高，中央银行金贮备的增减变动情况就越能反映贵金属在国际间的流动情况。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一尺度都不可能十分准确。因为银行金贮备量的变化并不完全受贵金属在国际间流动情况的影响。例如，当贵金属流入增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用于国内流通和制造奢侈品的贵金属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并且超过了贵

属的流入量的时候，就会动用银行贮备里的贵金属，此时，虽然贵金属的流入增加了，但是银行的金贮备量却反而减少了。这说明，虽然贵金属的国际流动情况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贮备情况来衡量，但是纯粹以银行金贮备的增减变动情况去判断贵金属在国际间的流入和流出情况是不准确的。

其次，中央银行金贮备的用途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句话，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100]，这些金贮备就是为了应对国际支付而存在的，它的数量会受国际支付差额的影响；二是“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101]，这些金贮备是为了满足国内货币流通的要求而准备的。三是“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102]这些金贮备是为了应对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需要而准备的。上述三点的任何一点受到影响，都会影响到银行的金贮备。

最后，如果国内贵金属的减少成为一种趋势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将会导致银行的金贮备不断减少。当金贮备下降到中等水平以下，也就是几乎达到了金贮备的平均最低限度时，“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的形式。”^[103]这个平均最低限度不是固定的，而是各个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规定的。如果贵金属的流出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就会进一步的引发国内的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

第四个要点：贵金属的国际流动和经济危机的关系。

关于两者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三点：一是“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逐步接近危机的预兆。”^[104]在第二个要点的最后已经简单论述过，这里对其进行更加详尽的论述。在产业循环的繁荣阶段，市场商品严重过剩，这就导致购买生产资料和商品的贵金属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收，出现贵金属外流的情况。银行此时的金贮备严重不足，所以会通过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吸收借贷资本，在此基础上，信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最后达到膨胀的程度。但是，伴随借贷资本增加的同时，贵金属的贮备却严重不足，此时的资本家担心手中的有价证券未来哪一天会贬值或者变得没有价值，他们就会纷纷选择将手中的有价证券兑换成贵金属贮藏在自己手里，这样的话，信用就会受到动摇，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就会爆发。

二是“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逆转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105]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性的论述已经被当时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实。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建立在贵金属长期流出基础上导致的信用和货币危机上的。在贵金属长期流出这一情况结束，贵金属的输入超过它的输出时，此时的借贷资本将会

显得过剩，银行会更加倾向于贷出更多的借贷资本给资本家。这样的话，信用得到恢复并且进一步扩大，相对应的商品生产也会得到扩大，但是此时商品依然过剩，居民的购买力依然疲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容易爆发经济危机。

三是“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106]当经济危机结束后，经济自我调节的职能又可以正常的发挥作用，贵金属会从金贮备过多的国家流入到金贮备低于正常水平的国家，从而保证各国的金贮备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

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107]资本家力图用各种脱离金属货币支撑的价值符号去取代金属货币，以便让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变得更加的无拘无束，但是，“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票据、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现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108]也就是说，不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再怎么发展，那些象征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永远也不可能取代金属货币本身。在国际货币流通的过程中，贵金属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是永远也不会被取代的。

3.3.2.2 贵金属国际流动的汇兑率问题

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由于国际信用的发展，国际间货币流通的收支差额也可以用信用货币来结算。这些信用货币包括商业证券和银行证券等，它们同外币一起统称为外汇。国与国之间在用外汇开展结算业务时，就会存在两国货币的兑换比率问题，这种兑换比率就被称为汇兑率或者外汇行市。那种由两国单位货币含金量所确定的比率被称为货币平价，这一平价就是汇兑率的基础。

因为外汇的价格是随着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交流中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就需要用外汇去支付这一差额，导致其对于外汇的需求扩大，这样就可能出现国内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满足这一扩大的需求的情况，外汇的价格也就会相应的提高；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时，国内的外汇储备有可能会多于需求，此时的外汇的价格就会相应的降低。

外汇价格的提高和降低不是随意的，它是有一个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由货币平价来控制的。因为货币平价是汇兑率的基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由货币平价所决定的汇兑率会和货币平价保持一致，可以说货币平价就是汇兑率的一个尺度，这个尺度也是为

人们所接受的。因为贵金属可以在各国之间通过流动来结算业务，所以人们可以通过直接运送贵金属的方式去结算业务。运送贵金属还要支付一定的运费。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时，外汇价格就会过高，人们就会将其与货币平价和运费价格之和去作比较。如果外汇价格高于这一价格，人们就会选择采用直接运送贵金属的方式去结算差额。当出现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时，对于外国来说就是逆差，同理，外国也会将贵金属直接作为支付工具进行结算，所以，当外汇价格低于外汇平价和运费的差时，就会发生黄金的流入。

当一国的贵金属长期处于流出的状态时，该国的金储备就会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国就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去阻止金储备的进一步减少。“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109]因为在贵金属大量流出的时候，国内可以用于流通的贵金属就会减少，银行的金储备也会相应的减少，对于借贷资本的需求就变得更大了。银行此时为了吸收更多的货币，就会提高利息率，外流的一部分贵金属又会流入银行而成为借贷资本。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来阻止贵金属的进一步外流。在“虚拟资本”部分论述过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会被当做是一个资本的利息，所以当通过有价证券所取得的货币收入一定时，利息率越高，有价证券的价格就会越低，就会吸收更多的外资来购买本国的股票，这就进一步改善了贵金属流出的情况。除了提高利息率这个方法，银行还可以通过提高贴现率的方式阻止贵金属的外流。银行提高商业票据的贴现率后，商业票据的持票人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实现票据的贴现。通过提高票据贴现率，银行在给持票人贴现票据时会扣留更多的贴现息，付出更少的货币；同时，部分持票人还会因为票据贴现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选择不贴息，这样也可以阻止贵金属的外流。

总之，从对信用与货币流通的研究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金属货币的位置，但从货币的国内和国外流通中可以看出，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一切代表货币的价值符号都只有兑换为金属货币后，资本家才能安心。不论信用制度再怎么发展，它也必须与货币制度相适应。虽然信用制度看似取代了货币制度的位置，但是信用制度却永远也不能摆脱货币制度的限制。

3.4 信用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论述了“信用”的界定和在“信用”的介入下形成银行资本，并进一步形成虚拟资本的理论，而且还论述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的货币国内国外的流通问题。马克思的这部分论述其实已经说明其对于资本的研究已涉及到“金融

资本”。马克思对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金融资本领域，它还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领域，而且更多的是在产业资本领域的研究。从马克思在“信用和虚拟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信用”作用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商业信用和形成银行资本，并进一步形成银行信用、促成虚拟资本。这是“信用”作用下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却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也仅仅只是从产业资本中脱离出来的部分，所以对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研究主要还是要落脚于产业资本领域。

马克思在“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的研究中指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10]这说明“信用制度特别是银行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二重的，一方面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解体，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111]从信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作用可以看出，“信用”介入资本主义生产后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3.4.1 信用的积极作用

3.4.1.1 信用促进利润率平均化

马克思在对产业资本的论述中就已经表示平均利润率是资本能够在各个部门之间自由转移的前提下，通过部门之间的互相竞争而实现的。但是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本都有其特殊的形态和作用，在没有信用介入的时候，资本就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才能从一个部门顺利的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这一过程往往是困难的。尤其当这一资本是流动性很差的固定资本的时候，这一过程就会更加的困难。这些资本转移中的困难，妨碍着资本的自由流动，最终会阻碍到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对于这一困难，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他表示：“单个资本作为整个阶级的总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另一方面，整个阶级的总资本根据生产的需要在不同的特殊领域之间进行分配。这是通过信用进行的。由于信用，不仅这种平均化成为可能并变得易于进行，而且资本的一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实际上表现为整个阶级用以从事经营的材料。这是信用的一种意义。”^[112]从马克思给出的方法中可以看出，只有引入信用才能解决资本流动困难的问题。当信用机构——银行向外贷出大量资本，资本就会投机性地涌向利润率高的部门，与此相

对应的是，利润率低的部门几乎没有资本流入。部分利润率低的部门也会在高利润的吸引下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利润率高的部门，这个时候投入到高利润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过剩，商品的产量大于需求。资本家为了尽快卖出商品就会选择降低商品价格，利润率也就会相应的下降；与此对应的是，由于可用于生产的资本不足，利润率低的部门就会降低生产，从而导致生产的商品供不应求，使得价格上升，利润率上涨。在两类部门的竞争和博弈后，利润率最终走向了平均化。正是由于信用解决了资本自由流动困难的问题，才促成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又可以对社会再生产起到调节作用，从而促进社会再生产在一个更加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3.4.1.2 信用节省各种流通费用

马克思在“信用和虚拟资本”部分详细介绍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两个信用的主要形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在“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部分论述了信用是如何节省流通手段，即如何节省货币量和银行券。这一部分的论述对于解答信用是如何节省各种流通费用的问题是有极大帮助的。

对于“信用是如何节省各种流通费用”的问题，马克思从两个方面给出了解答。

首先，在“信用节省了流通中的货币量”研究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信用是如何节省各种流通费用的。在以金属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磨损和工人生产其要花费的劳动共同构成了它的流通费用，也就是说，金属货币本身就是一种流通费用。所以，节省流通中的货币量就可以节省流通费用，而信用就可以节省流通中的货币量。所以对于“信用是如何节省各种流通费用”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可以转变为“信用是如何节省流通中的货币量”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本人已在上文“信用与国内货币流通”部分已经作了很详细的论述，这里只做简单列举和补充。

马克思认为信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节省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节省流通费用。其一，相当一部分的商品买卖是通过商业票据的形式展开的，这就可以做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113]，进而节省各种流通费用。其二，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可以节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进而节省各种流通费用。其三，随着信用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金币为纸币所代替”^[114]，流通中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这样的话，用于生产金属货币的流通费用也会减少。

其次，马克思在“信用是如何使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加快”研究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信用是如何节省各种流通费用的。在对“信用”进行界定的时候，就已经引入了资

本循环的公式 $G—G—W < \frac{P_m}{A} \dots P \dots W'—G'—G'$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不论是在 $G—W$ 这样的商品或者生产资料的购买环节，还是像在 $W'—G'$ 这样的商品销售环节，进行商品买卖的职能资本家之间都可以采用像商业票据这样的信用工具实现暂时的赊购赊销。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使流通阶段缩短了，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也加快了，从而使再生产的过程也得到了加快。此时，那些留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货币准备金的数量也就会显得过多。货币所有者就会将这些准备金存入银行，此时在货币形态上存在的货币准备金也就会相应的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就会减少，信用也就节省了流通费用。

3.4.1.3 信用加速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

大资本家凭借信用可以吸收和支配他人的资本，这可以加速资本的集中。随着资本的进一步集中，股份公司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了。信用不是股份公司产生的原因，但它对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加速作用。这是因为股份公司的资本正是依靠发行股票而集中起来的，而股票的发行基本都是由银行来执行的，这说明股票本身就是一种长期信用凭证。联合起来的私人资本家通过股票来集中资本的过程其实就是信用加速股份公司形成的过程。当股份公司和与此相适应的资本新形式——股份资本出现以后，在资本关系上就出现了如下的新特点：

第一，随着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资本集中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股份公司可以通过股票吸收大量的资本，这一特点使股份公司突破了私人资本家在资本量上的限制，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有利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过去那些私人资本无法承担、只能由政府经营的大企业，股份公司大量吸收资本后也可以经营。

第二，随着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资本变得更加的社会化。以前的资本主义企业只是某个私人资本家的私人企业，但是，随着这些私人资本的集中，那些由多个私人资本家联合起来建立的社会企业也就出现了，并且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就是私人资本发展为社会资本，私人化的资本转化为社会化的资本的过程。这就是说，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的一次改变，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抛弃了过时的形式，采取了新颖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资本关系自我扬弃的过程，也就是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过程。

第三，随着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资本的所有权和职能完全分离开来。在私人资本的背景下，一家企业资本的所有者和发挥这一资本职能即行使资本使用权的资本家往往是统一的，并不会分离开来。他们虽然会雇佣工人为其劳动，但是他们不仅

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且还会通过亲自监督工人劳动的方式行使资本的职能。现在，随着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私人性质的企业也转变为社会性质的企业。在这个联合性质的企业中，企业资本所有者的人数很可能会大于管理者的人数，此时，管理者的角色要么由某些资本所有者担任，要么就是雇佣其他人员即“职业经理人”来担任。这些实际管理、经营企业业务的人员被称为“经理”，这样一来，“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115]。股份公司的资本所有者是公司的所有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抛弃了自己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而不亲自参与公司的经营。资本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职能资本家了，此时的“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116]。他们将货币资本交由经理使用，自己并不参与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只需凭借“贷出”的货币资本这一生息资本取得“利息”。但是，这一“利息”不仅包括利润中的利息，而且还包括大部分的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大部分的利润，只不过这些利润以“利息”的形式存在。资本家给这种“利息”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股息。股息被认为是股票所带来的利润，归资本所有者所有，而股票又是资本所有权的一种票据表现形式。

对于两权分离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情绪高昂地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117]两权分离的股份公司给私人性的资本赋予了社会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股份公司的出现虽然会在短期内加剧剥削，但是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18]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实现了私有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的第一次跨越，它还将实现社会资本转化为生产者财产的第二次跨越。

3.4.2 信用的消极作用

马克思在对“信用”的研究中不仅看到了“信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积极作用，而且还看到了“信用”作用下实现制度跨越的可能性。除了这些积极的影响外，“信用”还会在很多方面带来消极的影响。

3.4.2.1 信用助长投机行为

在对“信用”的研究中，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信用很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而且导致这一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用助长下的投机行为。马克思表示：“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119]这其实就是信用为什么可以助长投机的重要原因。在信用的介入下，“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120]也就是说，“投机是拿别人的财产投机；节约是要求别人的节约”^[121]。投机行为更方便也更易出现在银行，银行家更具备投机的条件。因为银行资本的绝大多数是虚拟资本，其数量是远大于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数量，而且其除了少数来自于银行家自有资本的投入，更多的还是银行通过银行信用吸收的社会存款。在这样的条件下，银行家就可以利用大量的银行资本进行反复的投机和欺诈活动。这一投机行为如果成功的话，银行家就可以攫取大量的财富；这一投机行为如果失败的话，损失更多的也不会是银行家自己，而是那些存款的所有者。除了银行家的投机，一些职能资本家也会通过银行信用进行投机。例如，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生产非常繁华，此时的信用投机也非常严重。许多职能资本家为了通过购买铁路股票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将他们的商品向银行作抵押获得贷款，然后再将其投入银行去购买铁路股票，以期通过这一方式进行投机，从而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除了这一方法进行投机，他们还会利用委托销售制度去获得贷款并且进行投机。信用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也助长了投机行为的出现。

3.4.2.2 信用扭曲资源配置

资本家在无偿取得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后，他们会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消费资本用于享受，另一部分作为产业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中的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生产，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所决定的。但是，信用的介入，却让这一资源配置比例出现扭曲。

马克思表示：“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122]也就是说，信用事业和投机的发展，使得致富的渠道变多。在这一阶段，通过挥霍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富有，从而取得银行的信用，并进一步取得扩大再生产或者投机所需的贷款的

方式就是致富的一种典型渠道。此时“作为信用手段的奢侈是对禁欲说的一记耳光”^[123]。这一现象在资本家之间普遍存在，这就会形成一种怪象，即资本家在获得剩余价值后，为了致富，他们不但不增加产业资本的比重去扩大再生产，而且还扩大消费资本的比重去扩大奢侈的消费。在此基础上，那些本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产业资本的数量减少，消费资本的数量反而增加。这样一来，信用就扭曲了资本主义资源的配置。

3.4.2.3 信用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信用可以助长资本主义的投机行为，并且随着其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很可能在此基础上爆发。

在信用助长投机行为之前，人们在进行商品的买卖的过程中，都是在售出或者购进了商品后才会开出相应的商业票据，然后债权人才可以凭借这一商业票据到银行提取现款。随着投机行为的盛行，人们可以凭借委托销售制度等工具更早地取得货款。现在，在预定商品后就可以开出银行贴现的商业票据，持票人在还没有承担给付商品的义务前就已经可以以债权人的身份到银行去贴现票据，并取得现款。这一现款将被用于再生产或者进一步的投机，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虚假繁荣的景象。此时的生产无限扩大，大量的商品在不考虑需求的前提下被生产出来。但是，生产的繁荣不表示需求的繁荣，此时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相矛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商品开始滞销。资本家哪怕愿意降低价格或者接受信用货币，此时的商品供给量依然远多于需求量，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在所难免了。

经济危机爆发后，“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124]在信用收缩的情况下，虽然那些商品滞销的资本家急于出售自己的商品，但是他们哪怕降低商品价格来获得现款，也不愿意接受可能是一张废纸的信用货币。这个时候，购买者想要通过信用的方式获得商品就会比较困难。随着支付的普遍停滞，社会上的大多数企业就会被动破产。不论是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还是银行资本家，他们在这场危机下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信用不仅会助长投机行为，而且还会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爆发后，其所波及的范围会很广。

生息资本是在信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银行资本又是在生息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银行资本中的大多数都是虚拟资本。在没有爆发经济危机以前，他们基本就被当做现实的资本使用，这将导致信用的进一步膨胀，将使拜物教的高度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

教的高度提高到资本拜物教这一拜物教的顶点。

第4章 马克思信用理论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信用的研究主要就是围绕信用的主要形式——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以及由此创造的虚拟资本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当前我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信用风险又主要集中于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虚拟资本领域，所以利用好马克思信用理论可有效防范化解我国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以及虚拟资本领域所存在的信用风险。

4.1 对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数字经济的发展要为产业的发展服务，而我国产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商业信用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信用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范围也已突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限制，开始向企业与个人之间拓展。由于篇幅有限，研究仅针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而这类商业信用活动又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防范好我国的商业信用风险既有利于商业信用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数字经济的接续发展。马克思商业信用理论虽然诞生于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撇开其中的制度因素，它所包含的关于信用、商业信用的界定及其正反作用的论述，都是对商业信用管理、对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在当前以信用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中，马克思商业信用理论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研究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4.1.1 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与主要风险

4.1.1.1 我国商业信用的发展现状

(1) 应收账款发展现状。企业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为了促进销售或者实现短期信用融资的目的，往往会采用赊购赊销的方式，这样就会产生一些应收而未收的款项，这些应收而未收的款项俗称为应收账款。应收账款是企业的一笔资产，同样也是企业重要的流动资产，构成了企业营业收入的一部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22 年，其应收账款高达 21.65 万亿元^[125]，并且增速自 2012 年以来就基本保持在 10% 左右^[126]。截至 2023 年 9 月底，这一数额已经达到 23.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127]同时，还可以以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去衡量应收账款的收回速度，这一指标在 2015 年还只有 35 天^[128]，

但截至 2023 年 9 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 63 天^[129]，而过长的回收期会给企业正常的经营带来风险。

应收账款与流动资产和营业收入所构成的相对指标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重要标志。2012 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25%左右，而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 2018 年以来就整体保持在 15%左右^[130]，截至 2023 年 9 月底，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24.65%^[131]。相较于可以直接背书转让的商业汇票，传统应收账款流动性较差，其要想达到流通转让的目的，就只能通过抵借、让售等方式实现，这不仅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还增加了坏账风险，所以应收账款在流动资产和营业收入中的高占比会降低流动资产的流动性，阻碍资金的周转和运营，进而阻碍企业收入的实现，影响企业利润，例如，24.65%的高占比换来的是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9%的结果^[132]。针对传统应收账款流动性较差的问题，企业可通过创新应收账款融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企业可通过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质押和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目的。

（2）商业汇票发展现状。商业汇票作为我国商业信用的主要工具，是由债务人签发，委托第三方承兑机构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债权人的凭证。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商业汇票的功能从最初的结算功能，又衍生出流通、投资和融资等功能。2022 年，商业汇票的承兑发生额为 27.4 万亿元，承兑余额为 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133]2023 年 9 月份，商业承兑汇票单月发生额为 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57%。^[134]可见，近几年的商业汇票保持着可观的增长态势。在我国，商业汇票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据上海票交所发布的《2021 年票据市场发展回顾》可知，2021 年，我国商业汇票市场承兑金额为 24.15 万亿元，其中商业承兑汇票为 3.8 万亿元，仅占比 15.73%，其余皆为银行承兑汇票。这种不均衡的结构是由两种汇票承兑人的信用程度差距所导致的。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作出承兑，信用风险较低，而商业承兑汇票则是由第三方企业作出承兑，信用风险较高。

我国的票据融资方式主要就是采用商业汇票贴现的方式。2012 年以来，票据融资规模整体保持着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在 2022 年底达到 128090.48 亿元^[135]，较 2012 年增长了 526.87%，同时商业汇票贴现发生额为 19.5 万亿元^[136]。截至 2023 年 9 月底，这一融资规模已经达到 124735.8 亿元^[137]，同比增长 0.99%，同时贴现单月发生额为 1.9 万亿元^[138]，同比增长 46.15%。自 2009 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建成以来，十几年的发展使电子商

业汇票逐渐取代了纸质商业汇票的主导地位，成为最主要的商业汇票形式。近几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更是取得了许多创新性发展。例如，上海票交所在 2020 年和 2022 年先后开发并上线运营的供应链票据平台和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都是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又一次创新性发展的体现。

(3) 企业举债经营现状。除了应收账款和商业汇票这些未变现的资产外，企业大量的举债经营资金同样是商业信用的体现。截至 2022 年底，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为 359786.85 亿元^[139]，同比增长 9.36%，中长期贷款为 855684.53 亿元^[140]，同比增长 14.73%。截至 2023 年 9 月底，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 399128.02 亿元和 975023.01 亿元^[141]，同比增长 10.17% 和 17.24%。这些贷款都成为了债务企业举债经营的资金，而一旦债务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其在债务到期后就会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进而带来极大的商业信用风险。

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资产负债率指标往往被债务企业用来衡量企业的举债经营能力，被债权企业用来衡量发放贷款的商业信用风险程度。2022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限额以上的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和餐饮业的资产负债率整体保持在 75% 左右，而且这种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从 21 世纪以来就一直保持着。^[142]这些第三产业的高资产负债率水平意味着企业自有资产过少，举债经营程度过高，这虽然与其产业特点有关，但同样也会带来很大的商业信用风险。相较于这些第三产业，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会更低一些。2012 年以来，这一比率整体保持在 57% 左右。^[143]这一比率虽然保持平稳态势，但是负债却常年处于攀升状态。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合计 88.3 万亿元，增长 8.6%。^[144]截至 2023 年 9 月底，负债合计 94.63 万亿元，增长 6.7%。^[145]由此可见，不论是一些第三产业企业，还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举债经营规模都在整体扩大，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风险还在与日俱增。

4.1.1.2 我国商业信用的主要风险

(1) 投机风险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商业信用的各种衍生发展，不仅促进了资金的流通，繁荣了商业市场，而且还助长了各种投机行为。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较高的应收账款增速和占比营业收入可以看出，企业的营业收入中，应收账款就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这说明企业可能为了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采用了投机的方式，刻意放松对于客户的信用审查，以此获得更多的应收账款，虚增收入，使企业利润变得更加可观，从而获得更多的投资资金。在供应链金融下，企业可通过保理、质押和证券化的方式达到应收

账款融资的目的，但这些创新方式在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投机风险。首先，部分企业会将伪造账款和已清偿账款用以融资，这会给提供资金的相对方带来直接的财务损失。其次，即使企业采取合理的方式取得融资，这些融资款项同样可能会被拿去投资于一些高回报，同时伴随高风险的项目，最终带来极大的商业信用风险。

投机风险不仅会出现在应收账款领域，还会出现在商业汇票领域。商业汇票近几年在我国保持可观增长态势的同时，也增加了各种票据投机的风险。商业承兑汇票方面，由于我国商业承兑汇票的相关监管机制还不太成熟，第三方承兑企业的承兑资质往往得不到准确评估，这方便了债务企业与第三方承兑企业的投机行为，增加了债权企业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承兑汇票方面，企事业单位从金融机构那里取得的票据融资主要就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实现的。这种融资方式一定程度上异化了银行承兑汇票的功能，给部分企业联合票据代理中介，进行票据投机留下了可操作空间。电子商业汇票方面，在克服了一些纸质商业汇票的缺陷后，电子商业汇票依然存在诸多投机风险。由于电票系统对于接入企业的信息采集机制还不够完善，这就为部分企业凭借伪造的营业执照和印章等证明材料，到银行开立账户，然后在电票系统上签发虚假商业汇票创造了条件。此外，电票系统偶尔出现的一些技术漏洞也会给企业投机创造机会。例如，某农商行支行的电票系统在签发环节出现漏洞，两家企业利用这一漏洞，在该行电票系统上不断将商业承兑汇票处的承兑人修改为该行的名称并流入市场。这种商业承兑汇票在流转时很容易被当成银行承兑汇票而被接纳，从而给银行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146]

（2）流动性风险压力不容小觑。商业信用的广泛使用，不仅会助长各种投机行为，而且还会增加企业的流动性风险。陷入流动性风险的企业，即使具有清偿能力，也无法及时取得足够的资金去应对资产的增长和负债的到期清偿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经营的流畅性和持续性，降低其盈利能力。近些年，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超过两个月的平均回收期可以看出，应收账款兑现的时间越来越长，流动性风险越来越大。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在流动资产中的高占比可以看出，企业可能存在资金回笼能力较弱，流动性较差的情况。此外，其应收账款在营业收入中的高占比也说明企业的营业收入中还存在大量的未兑现收入，不仅会影响企业利润的实现，而且还会降低企业的偿债能力，增加流动性风险。在供应链金融下，应收账款的各种融资方式虽然缓解了流动性风险，但在流动性方面依然不及货币资金。商业汇票可采取背书的方式实现流通，流动性强于应收账款。但是，商业汇票的背书会受到各种限制，尤其是商业承兑汇票，其所具有的

较高逾期风险使其在日常的采购、生产和交易方面的流动性远不及货币资金。持票的债权企业往往很难背书转让这种票据，从而错过将资金用于流动周转，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机会。

2012 年以来，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负债数量存在着较大规模的增长，而负债的到期清偿压力会给企业带来流动性风险。债务企业如果遇上市场大幅波动，企业经营受损的情况，就会造成流动性危机，严重还可能导致企业破产。此外，相较于负债的逐年递增，企业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的准备资金相对减少了。例如，截至 2023 年 9 月份，我国签发票据的中小微企业达 10.5 万家，占全部签票企业的 91.8%，而签票发生额 1.8 万亿元，在全部签票发生额的占比同样达到了 65.7% 的高水平。^[147]由此可见，中小微企业是我国商业信用的主力军，其往往背负着较多的负债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缺少固定资产等优质抵质押物，其融资往往比较困难，缺少足够的准备资金，流动性风险缓释能力较弱。

(3) 坏账风险增加趋势明显。商业信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投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都可能引发企业的坏账风险，但企业坏账风险的来源却远不止如此。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体量的应收账款及较高的同比增速来看，赊销方式在企业交易过程中被更多的采用，而赊销行为的增加也导致了违约风险的增加。此外，营业收入中，应收账款的高占比也说明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坏账风险较大，经营效率不高。供应链金融下开展的应收账款融资同样也会增加坏账风险。不论是融资过程中的风险评估，还是融资过后的资金使用，企业想要做好信用风险预警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在融资评估过程中，债权企业如果刻意隐瞒债务企业无法或者不愿清偿债务的风险，评估的金融机构往往很难掌握真实信息，进而得出不准的评估结论。在融资资金的使用过程中，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会受到供给侧和需求侧市场波动的影响，金融机构要想实现对融资企业和债务企业经营情况的实时监测还是非常困难的。信用风险预警工作的难以开展，使企业的经营一旦出现困难，就可能降低应收账款融资的还款率，引发坏账风险。

商业汇票增长可观的态势下，同样也潜藏着一定的坏账风险。商业承兑汇票往往是由资金充足、在供应链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签发。这种票据存在较大的逾期风险，不仅会给企业带来坏账风险，搅乱供应链秩序，还会蚕食掉中小微企业的部分利润。部分大型企业会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频繁采用签发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去支付货款，而商业承兑汇票又存在逾期风险高、流动性差的特点，往往难以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所

以会间接蚕食中小微企业的部分利润。部分大型企业对于商业承兑汇票的滥用，最终可能会造成逾期、甚至无法兑现的后果。中小微企业将持有大量坏账，这不仅会导致其经营规模的缩小，还可能会导致其资金链的断裂。资金链断裂的中小微企业无法偿付自身债权人的款项，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将这种坏账风险不断传导下去，搅乱供应链秩序。银行承兑汇票因为有银行承兑的保证，所以持票企业一般不会出现坏账的情况，但是银行反而会面临较大的坏账风险。例如，当申请银行承兑汇票的企业以少于票面承兑金额的保证金取得汇票后，即使出现未按期或者无法支付的情况，银行依然需要见票即付，这样就会损害银行利益，同时还会将这种风险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

4.1.2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

4.1.2.1 提高风险评估水平，做好信用风险预警

马克思认为，商业信用导致的买卖行为的较长时间分离会成为投机的基础。大量的投机行为会导致产能过剩，加重坏账风险。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商业信用风险所带来的危害将蔓延至整个资本市场，甚至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企业在接受商业信用前后，对于相关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估和重估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做好信用风险预警工作的关键所在。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企业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融为一体，使其协同作用于企业受信前后的信用风险评估和重估工作上。在受信前的信用风险评估上，企业可在区块链上共识相关企业数据，并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和深度挖掘，从而更深入掌握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承兑资质，更准确评估其资产情况，降低其违约风险，从根本上做好受信前的信用风险预警工作。针对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存在的较高违约风险，监管机构还需完善相关监管机制，从技术创新和机制完善两个方面着手做好信用风险预警工作。同时，对于那些无重大失信行为、存在较大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进行信用风险评估时，可适当放宽评估标准，协助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活动，提高相关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当前，不论是商业信用的监管机构，还是受信企业，都更重视受信前的评估和审批工作，而相对轻视受信后的风险预警和跟踪监测工作。在这样的受信背景下，融资款项很可能会被用于高回报、高风险项目的投机上。当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受信企业往往无法及时作出反应，进而给企业利益造成损害。监管机构需要提高

对于企业受信后风险预警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快推进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此外，企业开展的信用风险重估工作还需要建立在对大量动态数据的分析上，以往按照相关企业一定时期静止数据的重估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企业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构建与相关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链接，加快相关企业数据的收集，拓宽大量非结构性数据的获取渠道。大量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的实时整理和挖掘将实现对于相关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动态监测，实现信用风险的动态重估，从而做好受信后信用风险的预警工作。

4.1.2.2 利用好区块链技术，缓解商业信用风险

马克思认为商业信用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但是，商业信用会造成商品让渡与价值实现的分离，这又会助长投机行为，增加流动性风险和坏账风险，阻碍商业信用积极作用的发挥。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先进数字技术的运用可有效缓解商业信用风险，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积极作用。

针对供应链金融下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质押和证券化融资所带来的投机和坏账风险，企业可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引入来缓解。传统供应链金融体系上的核心企业信用优势仅能传递给下级分销企业，而且核心企业还会依仗优势地位蚕食中小微企业的部分利润，而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和基于共识算法建立的共识管理机制，可使核心企业的应收账款数字凭证通过分布式方式进行确权和流通，从而使其信用优势的传递突破传统限制，覆盖到供应链中的所有企业。区块链技术可实现供应链金融数据的可追溯和不可篡改，进而营造了供应链系统的可信环境，提高了交易的成交率。同时，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还可通过预设合约条款设置触发条件，并识别相关信息，当达成触发条件时，合约条款将被自动执行，从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这样的供应链金融尤其有利于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供应链金融中的中小微企业，无论是否与核心企业有直接的交易行为，都可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优势开展应收账款的保理、质押和证券化融资业务，在缓解利润蚕食风险的同时，还可缓解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和坏账风险，并降低企业的投机意愿。

除了可以缓解应收账款融资方面的商业信用风险，区块链技术还可缓解商业汇票业务的相关信用风险。区块链技术在商业汇票业务中的运用推进了数字票据的产生。数字票据可确保商业汇票交易信息的透明性、难篡改性和可追溯性，降低了技术漏洞出现的可能性，其中的智能合约技术又可通过对于出票人信息和收款人要求的预先设定，极大

降低相关企业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申请开票权的得手率，缓解票据投机风险。基于区块链技术，我国已经研发出数字人民币。截至 2022 年底，流通中的数字人民币余额就已经达到了 136.1 亿元。^[148]数字人民币所具有的安全性、高效性、可追溯性以及便捷性为商业信用作用的完全发挥，以及商业信用风险缓解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渠道。区块链技术虽然在商业信用缓解方面具有极大的正向作用，但是其储存海量数据，以及分析和挖掘数据背后信息的能力还不够，而云计算技术可实现海量数据的分布式计算和存储，大数据技术可分析海量的交易数据，为相关企业画像，这刚好可以弥补区块链技术缺陷。

4.1.2.3 增加准备资金储备，实现信用合理扩张

马克思认为，商业信用出现的初衷就是为了推进商品流通，加快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进而保持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可以说，商业信用出现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为了缓解产业资本的流动性风险。马克思在资本逻辑批判的过程中，详尽地论述了产业资本规模边界的问题。商业信用的使用会受到产业资本规模的限制，如果职能资本家的扩张行为突破了这层限制，就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增加流动性风险。由此可见，流动性风险缓解的关键就在于确保产业资本规模的合理扩张，而产业资本规模扩张的过程就是商业信用扩张的过程。

流动性风险的缓解，可从增加准备资金着手。企业可按照一定比例，从利润中划出部分资金作为准备资金。针对那些缺乏固定资产等优质抵质押物，贷款融资比较困难的中小微企业，金融机构应适当拓宽抵质押物范围，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增加其准备资金。马克思就曾表示，贷款是“以有息证券、国债、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149]，由此可见，企业未来收益的权利和一切可以证明资产所有权的凭证都可作为抵质押物去获得贷款。

流动性风险与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规模合理与否有密切关系。过度的规模扩张往往会导致产能过剩，带来过多的应收账款、未兑现的商业汇票和过重的负债压力。流动性不佳的应收账款、商业汇票和过剩的产能一起，拖慢了企业资金的周转速度，阻碍了商业信用的顺利回流。企业要想将商业信用扩张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需借助数字技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入手。数字技术可作用于企业购买、生产和售卖全阶段。在供给侧层面，企业可利用数据共享优势更加精准的掌握消费者需求，通过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和创新链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企业的生产流程，并且通过“数据+算法+算力+平台”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按照消费者需求开展产品设计、研发和生产，满足消费者的普遍和个性化需求，形成数据要素驱动下的智能化生产、规模化定制和网络化协同的生产模式。在流动性风险严重的时候，这种生产模式下的高品质商品更能为消费者所接受，进而避免产能过剩，缓解流动性风险。在需求侧层面，产品的顺利出售决定着商品资本能否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能否实现复归，对此，马克思将商品资本职能的实现描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150]数字技术可协助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企业可凭借数字化平台将产品推向数字化市场，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数字代理人技术缓解消费者注意力稀缺的问题，进而拓宽企业单位时间交易所覆盖的空间范围，延长交易时间，扩大交易主体，增加企业单位时间的交易对象，提高企业产品的交易效率，实现供给与需求的交相匹配，畅通商业信用的回流通道，缓解流动性风险。

4.2 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的启示

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产业的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处理好数字经济与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实现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长足之道。商业银行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其管理的数字化将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创新进步，还有利于数字经济的接续发展。商业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会面临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类型的风险。近年来，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就在逐年增长，并且年平均增速保持在 10%左右^[151]，而且与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相比，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可以在三项加权资产中占比达到 91%以上，截至 2023 年 6 月，这一占比已经达到 93%。^[152]由此可见，在商业银行面临的各类风险中，信用风险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所以，对于商业银行管理方面的研究就要落实到信用风险问题上来。马克思银行信用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撇开其中的制度因素，它所包含的关于信用、银行资本的界定，关于银行资本的来源，关于银行开展借贷业务的方式，以及银行助长投机行为的理论，都是对银行信用管理、对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银行信用理论对于完善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4.2.1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现状与困境

4.2.1.1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的现状

(1) 关注类贷款数量明显增加。商业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关系紧密,商业银行的运行需要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支持和监督,而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发挥也离不开商业银行的配合。金融监管机构为了控制商业银行风险,设置了存贷比这一简单指标并规定其不得超过 75%。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贷比上限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出于这种考量,存贷比不得超过 75%的规定于 2015 年被取消。2015 年以后,商业银行存贷比就逐年递增并在 2019 年末正式突破 75% 大关,随后年份更是增长迅猛,2021 年末和 2022 年末更是分别达到 79.69% 和 78.75% 之多,截至 2023 年 6 月,存贷比依然保持着 77.69% 的高水平。^[153] 商业银行提高贷款比重的做法在提升盈利能力的同时也会相应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在商业银行的贷出款项中,正常类贷款占比基本保持在 95% 左右^[154],这得益于我国的宏观调控和商业银行对于贷款风险的有益控制,正因如此,我国才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内生性经济危机。但是近年来,诸如旅游、餐饮、运输等传统实体行业遭受重创,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下滑,违约风险增加,截至 2023 年 6 月,关注类贷款余额已经高达 42240.15 亿元,相较于 2020 年末的 37763.34 亿元增长了 11.85%。^[155] 关注类贷款是介于正常类贷款和不良贷款之间的一种过渡性贷款,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就会堕入不良贷款的行列。也就是说,2020 年以来,我国不良贷款增加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提高。

(2) 不良贷款余额额度依然庞大。金融监管机构在评估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时,往往将不良贷款指标作为其衡量银行资产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近十年来,受国际恶劣市场环境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增长,直到 2020 年末,不良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长率仍能维持在 10% 以上。2021 年以来,商业银行对于不良贷款的风险控制作用开始凸显,不良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大幅下降,2021 年末和 2022 年末的同比增速仅能维持在 5% 左右,但额度依然庞大。^[156] 截至 2023 年 6 月,不良贷款余额依然高达 32001 亿元,其中的可疑类和损失类不良贷款余额就高达 16928 亿元^[157],这些贷款大都无法收回,即使能够收回部分价值,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基本可以作为商业银行的坏账处理。那些借款人无法通过正常经营偿还贷款本息,只能通过抵押担保和处分资产的方式才能勉强维持的次级类不良贷款在 2023 年 6 月也达到了 15074 亿元^[158],而这类贷款的脆弱性又使其具有极高的坏账转化性。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不良贷款高体

量存在的现实说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虽然增速放缓，但逐年增长的趋势依然使其居高位，增加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3）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控能力有所增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逐年增加，信用风险日益严峻的当下，银行相对应的信用风险防控能力也在逐步增强。2012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预留的应付坏账的款项——贷款损失准备金每年都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并且增速普遍保持在15%左右，部分年份还会超过20%。截至2023年6月，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高达65963.28亿元，同比增长9.58%，相较于2012年末的14564亿元更是增长了352.92%。^[159]同时，基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与不良贷款余额相比求得的拨备覆盖率，从2012年末以来就一直保持在175%以上，2023年6月更是达到206.13%^[160]，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准备金的计提相对充足，信用风险防控的能力有所增强。除了坏账准备金准备相对充足外，商业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的储备量也相对充足。2017年末以来，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基本都保持在120%以上，远高于100%的监管标准，而且这一比例基本保持着逐年增长的态势，截至2023年6月，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50.86%^[161]，可见，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信用风险防控能力也在增强。

4.2.1.2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的困境

（1）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机制仍不成熟。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是信用风险识别和监测的重要手段，作用于授信前的风险识别和授信后的风险监测管理。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迅猛，其中的关注类贷款更是保持着逐年增长的态势，不良贷款余额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居高位，不良贷款率在2023年6月依然保持着1.62%的水平^[162]，可疑类和损失类不良贷款体量依然巨大。从这些信用风险预警指标可以看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机制仍不成熟，还存在诸多问题。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都更重视授信前的审批和坏账发生前后不良贷款的清收管理工作，而相对轻视授信后的风险预警和跟踪监测工作，如此一来，当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商业银行往往不能或者不能及时掌握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风险形成的初期往往是更容易控制的时期，商业银行掌握的授信企业经营情况数据与借款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数据之间的偏差使商业银行容易错过风险的易控期。授信后风险预警的缺失和迟滞将会导致关注类和不良类贷款增加，给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市场强势崛起，平台经济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信息不对称情况减少，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交易变得更加频繁，企业经营状况

更加易变，这些变化对商业银行动态、实时评估借款企业的信用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的手段主要还是依赖于对借款企业一定时期静止数据的计量和评估，这种信用风险预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需要。此外，传统信用风险识别的方式又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主要依赖于专业人才的经验，而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风险预警人才储备又不足，使得对于借款企业的经营情况难以准确掌握，从而降低了信用风险预警的准确性。

（2）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缓释手段单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缓释是控制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可以相应减少信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预留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逐年增长，拨备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在 2023 年 6 月更是分别超过 200%和 150%，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控能力有所增强。这些信用风险防控能力的指标，同时也是信用风险缓释能力的指标，信用风险防控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信用风险缓释能力的增强，然而，当前商业银行主流的信用风险缓释手段仍是实物资产的抵质押。

由于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一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商业银行为了追求信用风险的最小化，往往更加偏好向那些拥有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等优质抵质押资产的企业提供贷款。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批知识型和服务型企业实现了产业数字化，这些企业的特点就是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和较高的发展潜力，盈利能力较强，但资产轻质化，缺乏足够的商业银行认可的抵质押物，从而较难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这种做法忽视了对于企业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的评估，而这些评估指标才应该是贷款发放与否的主要标准。一味追求“安全的”抵质押实物资产的做法，只会让商业银行在错过更多盈利机会的同时，还需要在借款企业经营困难时被动处理大量坏账和抵质押物。当前，商业银行之间对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竞争非常激烈，盈利空间日渐萎缩，以往那种尽可能回避经营规模小，资产轻质化的小微企业、个人等普惠金融群体贷款请求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而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花呗、京东金融和招联金融等互联网消费金融模式开始出现，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方面的大量份额被蚕食，垄断地位受到挑战，改变已经迫在眉睫。

（3）商业银行押品管理机制还不健全。传统商业银行将抵质押实物多少作为授信与否决定性因素的做法虽不合时宜，需要创新授信方式，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抵质押实物依然还是风险预警和风险缓释手段的最主要评估要素，对于抵质押物品的管理依然是预防和缓释风险的主要手段。

押品管理在信用风险预警和缓释阶段的作用都非常重要，但我国商业银行对于押品的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授信前的阶段，对于押品的准确评估是确定贷款额度和防范信用风险的重要依据，但我国授信前的押品评估还不够准确，押品价值评估机制还不够健全。商业银行之间关于押品的价值评估流程各不相同，标准还未统一，而且商业银行还会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押品进行评估，而我国相关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还不太成熟，评估标准也还未统一，这种多主体、多标准的押品评估方式往往得不到押品的准确价值。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之间关于押品价值评估的问题就变得更为凸显。商业银行押品价值评估尚缺少可靠的价值评估技术支持，价值评估技术与数字技术融合程度还不够高，数字技术赋能价值评估的作用还未取得充分发挥，这导致押品价值高估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在授信后阶段，我国授信后押品价值的动态重估机制还不够健全。商业银行更加重视授信前押品的评估工作，对于授信后押品价值的动态重估工作往往并不重视，很多银行将押品的重估工作与贷款的状况相结合，部分商业银行甚至坚持贷款不出问题就不进行押品的重估。授信后押品的重估是贷款进行动态分类，坏账准备金拨备多少的重要依据，商业银行对于这一工作的不重视，不仅不能准确动态把握押品的价值、贷款的变化和准备金拨备量的要求，而且还会降低商业银行在风险爆发时的缓释能力。特别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的经营状况多变，押品的价值波动频繁，对于授信后押品价值重估工作提出更高要求的当前，授信后押品的动态重估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

4.2.2 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范的对策

4.2.2.1 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作用，坚持数字人才引育并重

马克思将“信用”界定为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运动，这种运动使货币的借出和收回行为发生了时间上的错位，于是在银行、企业或个人之间就产生了各种投机行为，投机的主体既可以是银行家，也可以是企业或个人。这种投机行为会严重损害银行、企业或个人的利益，严重还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所以，商业银行授信前的审批和授信后的监管对于做好信用风险预警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而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又随时都在实时的采集、传输大量的信息，并通过计算产生海量的可信数据。大数据技术可组织好海量数据、而人工智能可深度挖掘、处理数据，揭示数据背后的有用信息。商业银行可将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融为一体，使其协调作用于商业银行授信前后的信用风险评估

和重估工作上。在授信前的信用风险评估上，商业银行可利用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对借款客户的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并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更深入的掌握客户具体经济状况、更准确的评估客户资产情况，确定客户的信誉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客户违约风险，从根本上做好授信前的信用风险预警工作。在授信后的信用风险重估上，不论是金融监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都要提高对于授信后风险预警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需要更快推进。此外，以往那种按照客户一定时期静止数据的分析来重估信用风险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商业银行可利用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构建与政府、税务等机构的数据共享链接，加快外部企业数据的收集，拓宽大量非结构性数据的获取渠道。大量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的实时整理和挖掘将实现对于授信后客户贷款资金流向的动态跟踪、客户生产经营情况的动态监测，实现信用风险的动态重估，从而更加准确的预测风险，做好授信后信用风险的预警工作。

对于数字化风险预警人才缺失的问题，商业银行需要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做到企业内部培养、外界引进并重。一方面，银行要么内部开展员工技术培训、要么委托市场培训机构对在岗人员进行数字技能培训，优化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结构，提升他们的数字化水平，培育一批具有技术运用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数字化人才；另一方面，银行要大力引进数字化人才，提高引进人才的薪资和福利待遇，畅通人才的晋升渠道。

4.2.2.2 拓展信用风险缓释手段，改变贷款市场被动处境

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银行后，银行就可以大规模的支配他人的财产，并且采取票据贴现和抵押贷款等方式开展借贷业务，在货币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发挥中介人的作用。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采取的信用风险缓释手段主要为实物的抵质押，范围过于狭小，应该拓宽抵质押物范围。马克思描述的抵押贷款除了房地产等优质资产作抵押的贷款，还包括以有息证券、国债、各种股票，以及提单和栈单等各种能够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未来收益的权利依然可以作为抵质押物去获得贷款，而不仅限于实物资产。除了传统的抵质押物外，一切可以证明资产所有权的凭证都可作为抵质押物。例如，在农业领域，农产品的大额订单、售卖农产品的应收账款凭证等可作为质押物；在工业领域，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等可作为质押物；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持有的股票、债券，以及企业的商标、专利、版权，或者订单、应收账款凭证等都可以作为抵质押物。商业银行除了拓宽借款企业的抵质押物范围，还需

要拓展其他信用风险缓释手段。除了抵押贷款，马克思还指出银行可采用票据贴现、直接信用贷款、购买公司股票或存款透支等方式开展借贷业务。鉴于此，商业银行可引入第三方担保机制，提高第三方保证在银行授信中的比重，还可通过票据贴现、购买公司股票等间接方式提供贷款，除此之外，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用违约互换也是有效的信用风险缓释手段。对于盈利前景明朗、状况可观的知识型、服务型等第三产业企业可适当的提供一些直接信用贷款，减少相关企业的融资和还款压力。这些授信手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也被商业银行使用过，但并未得到推广。

在贷款市场上，互联网消费金融企业大行其道，商业银行落后的信用风险缓释手段使其市场份额被大量蚕食，处境极其被动。为了改变贷款市场的被动处境，商业银行拓展信用风险缓释手段的同时，还需要自主打造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相关业务，做好客户的信用风险缓释工作，处理好与互联网消费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除此之外，商业银行还需要处理好与互联网消费金融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共建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对于互联网消费金融企业的异构投资，实现银行金融业务的转型升级，提高信用风险缓释能力。

4.2.2.3 统一押品评估标准，提高价值评估水平

马克思认为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借贷运动会助长投机行为，所以银行授信前后的风险预警与缓释极其必要。押品作为抵质押贷款的最主要工具，在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借贷运动的过程中被多次提及，而且马克思还论述了押品形式的多样性，这些论述从侧面反映了押品在预防和缓释信用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健全的押品管理机制可以加强信用风险的预警与缓释。

金融监管机构要推动押品价值评估标准的统一，引导商业银行投入到银行之间、银行与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押品的标准制定中，尽可能构建统一、合理的价值评估标准。统一权威的价值评估标准将使押品数据的收集、存储和评估工作变得更加有序和标准化，促进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数据的共享、分析和整合。清除押品价值评估道路上的标准障碍，将有利于提高押品授信前的评估和授信后的动态重估结果的准确度。

在授信前的阶段，统一权威的价值评估标准只是提高评估结果准确度的前提，还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提高价值评估的水平。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可对押品数据进行整合和深度挖掘，掌握押品数据背后的客户信息；区块链技术利用分布式网络+非对称加密算法实现了数据的不可修改、提高了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实现了信息管理的去中心化，商

业银行与客户之间可以在更加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下开展抵质押等授信活动。商业银行可基于区块链技术使用与分享信任数据，这样可以较好解决虚拟数据问题，降低银行方面客户征信的数据处理成本和自动化运维成本^[163]。数字技术的运用可更好协助商业银行判定客户的信誉程度，从而得出授信与否的结论。在授信后的阶段，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加大对于授信后押品重估工作的监督力度，促进相关工作的规章化，以合理的指标要求加强商业银行授信后的押品重估工作。商业银行需利用好数字技术，根据押品的种类及价值波动特性，搜集影响押品价值波动的信息，开展适当的动态重估工作，使重估结果更好发挥信用动态分类和坏账准备拨备多少依据的作用。商业银行基于数字技术可更好实现押品管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以此更好实现授信前后押品的评估工作，从而做好对于客户的识别、计量、评估和监测等风险预警与缓释工作。

4.3 对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启示

数字经济是一种复合型经济，既包括实体经济，也包括虚拟经济，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数字化的部分就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以及金融监管的效力不足问题极易诱发金融风险，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的发挥，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找出金融风险的主要诱因，探究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研究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研究，而且还有利于数字经济的接续发展。虚拟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虚拟资本的发展，因此，关于虚拟资本的系统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虽然诞生于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撇开其中的制度因素，其关于虚拟资本的论述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4.3.1 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诱因

4.3.1.1 信用的过度扩张助长投机行为

信用的过度扩张可能形成虚拟资本及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虚拟经济活动，使信用过度作用于市场流通，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轨道，助长投机行为，为金融风险埋下伏笔。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信用扩张策略。这一时期的信用扩张采取“四万亿投资”方式刺激经济复苏，而这些投资资金的大部分都流入了国有企业。这一信用扩张举措在快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问题。2020 年以来，我国开展了新一

轮的信用扩张活动。本轮信用扩张采取了将赤字率提高到 3.6%以上，增加新增地方专项债额度达 3.75 亿元，发行万亿特别国债等举措。^[164]2022 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21.31 万亿元，同比增加 1.36 万亿元，其中，受信用扩张政策的引导，银行加大了对于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的力度。^[165]

信用扩张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经济的短期复苏，但是过度的信用扩张又可能助长投机行为，引发非法集资等投机乱象问题。部分企业在信用扩张政策下，以低成本取得资金后，可能将其投入风险，收益双高的金融产品中，这就为非法集资企业模仿金融创新，采取 P2P 网络借贷、网络炒汇和虚拟货币等模式夸大投资回报率，刺激企业投资意愿，进行非法集资留下了操作空间。非法集资类投机乱象问题最终可能导致企业资金的套利和空转问题，诱发金融风险。

4.3.1.2 虚拟利润的追逐膨胀虚拟资本规模

虚拟资本的发展推进了虚拟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而虚拟经济领域可观的虚拟利润和实体经济领域利润增长的持续走低促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2022 年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84038.5 亿元，比上年下降 4%^[166]，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其利润总额为 61154.2 亿元，同比下降 7.8%^[167]。鉴于统计数据标准的一致性，数据仅截选 2012 年至 2020 年区间。在这一期间，利润总额最高点出现在 2017 年，最低点出现在 2012 年，增幅仅为 35.28%，且年均增长率仅为 2.2%。相较于利润缓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趋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虚拟经济典型代表的商业银行的净利润自 2012 年以来就基本保持着逐年增长的趋势，截至 2022 年底，其净利润达 23029.76 亿元，同比增长 5.44%，较 2012 年更是增长了 85.93%，且年均增长率达 6.51%。^[168]

虚拟利润的持续走高使我国经济发展“脱实向虚”问题开始凸显，限制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会膨胀虚拟资本规模。正如马克思所述，商业票据、银行券、国债和股票等有偿证券形式都能形成虚拟资本，所以虚拟资本主要是以有偿证券的形式存在，包括债券、股票、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等形式。2014 年以来，我国债券发行规模扩大明显。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2023 年内各类债券发行合计达 590262 亿元^[169]，较 2014 年同期增长 530.13%，其中，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增长最为迅猛，增幅达 856.84%，公司信用类债券和政府债券次之，但增幅依然可观。与债券情况类似，股票市场的成交规模同样呈现扩大趋势。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2023 年内股票成交量达 14.06

万亿股，成交金额 176.72 万亿元^[170]，较 2012 年同期增长 565.92%。商业票据方面，商业汇票的承兑发生额在 2022 年达 27.4 万亿元，承兑余额为 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171]资本对于虚拟利润的追逐可能导致经济的虚拟化，冲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诱发金融风险。

4.3.1.3 金融监管的效力不足增加金融风险

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数据审核的非现场监管方式，而这些数据又大多来自于金融机构自行编制的财务报表，因此，监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不是实时的，只是过去一段时间内的静止数据，无法反映企业当前和未来的经营状况，而且，监管技术的不完善也为人为因素导致的数据不准确问题留下隐患。这些监管的不完善之处都导致了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的不对称问题，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力，增加了金融风险。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借助数字技术，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被创造出来，其在促进市场交易的同时，也使金融市场变得更加的复杂，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传统金融监管除了实时性不强，监管效力不高外，还会影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监管机构之间由于监管资源、目标和层级之间的差异，往往很难实现高效的协同监管，再加之监管信息的不对称问题，监管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优势往往得不到充分发挥。协同监管困难问题的长期存在会造成监管资源浪费的问题，导致监管出现重叠、越位，甚至真空的情况。部分金融机构正是利用金融监管的这些漏洞，开展投机活动，扰乱金融市场。传统金融监管的实时性不强，而且还不利于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这会降低金融监管的效力，诱发金融风险。

4.3.2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对策

4.3.2.1 实现信用合理扩张，完善失信惩戒机制

马克思表示，虚拟资本融资的便利性以及资本的逐利性都易使信用扩张行为出现过度的情况，从而助长投机行为和扭曲资源配置。信用过度扩张会导致产能过剩，增加金融风险，严重甚至引发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对产业资本规模边界问题展开的详细论述可以作为信用扩张规模的依据，缓解由于信用过度扩张所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针对投机乱象问题，完善的失信惩戒机制将提高企业的投机成本，有利于缓解信用扩张政策下的投机风险。

信用扩张规模不超过产业资本的规模边界是防范产能过剩，减少投机行为，预防金

融风险的重要举措。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已有的数据资源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公共产品特点^[172]，从而使数据具有了共享性的特征。政府在制定信用扩张政策的时候，可利用数字技术收集企业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挖掘，整合出新的有用信息，从而准确把握市场行情和产业资本规模边界。政府需要加大对于数据集成与共享平台搭建的投入力度，实现政府—企业数据的互联互通，减少数据孤岛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还可借助平台企业的现有资源，通过“数据+算法+算力+平台”的模式完成企业生产、销售数据的收集和整合工作。企业则要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共享各业务环节数据，协助共享平台的搭建，以此释放数据价值，把握产业资本规模边界，实现信用的合理扩张。

对于那些利用信用扩张政策，以低成本取得资金而不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的生产，反而开展投机活动的失信企业，完善的失信惩戒机制将对这些企业起到明显的惩戒威慑作用。监管机构可将失信企业的违约信息披露到征信系统上，设立失信企业“黑名单”，还可利用数字技术搭建起失信数据联网共享平台。监管机构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汇聚、筛选和组织好海量的失信数据，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大量失信数据的深度挖掘，揭示数据背后的有用信息。接入企业在交易之前，可通过共享平台提前了解相关企业的信用状况以及失信程度、原因等细节信息，从而降低接入企业交易的失信风险并提高失信企业的违约成本，让失信企业自行接受市场的惩戒和评判。监管机构除了对企业失信信息的披露外，还需要设定一个合适的保存年限。针对那些已经失信的企业，即使其已做好信用弥补工作，监管机构也应适当增加其失信信息的保存年限，增加企业的投机成本，从而达到投机行为减少，信用风险缓解的目的。

4.3.2.2 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与铁路修建的论述中可知，虚拟资本的出现拓宽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持，使实体经济的扩大再生产不再必须与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积累程度相匹配。这是虚拟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体现，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依据。为了限制虚拟资本膨胀，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缓解金融风险，“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73]。

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做好金融企业和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工作。从企业层面来看，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引育并重。企业可凭借自身资源，或者委托外部专业机构对在岗人员进行数字技能培训，进而优化他们的知识和

技能结构，提升他们的数字技能水平，培育一批具有技术运用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数字化人才，壮大企业的数字化人才队伍。此外，企业还需做好人才引进工作，不仅要提高复合型数字化人才的薪资和福利待遇，给予一定股权激励，还要打通其快速晋升通道，激发数字化人才创新的积极性。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除了要对企业的数字化人才培养工作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外，还需要扶持高等院校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工作，根据数字经济与交叉学科领域的融合情况，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增加数字技术类和实际操作类课程的比重，改革高等院校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保障企业所需数字化人才的供给。

银行等金融企业可搭建起与实体经济企业之间的供应链金融体系，并利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实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的。企业可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企业生产、生活资料以及产品的数据化，并利用云计算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储存和传输。供应链金融可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共识算法建立共识管理机制，促使核心企业的信用优势突破传统限制，覆盖到供应链中的所有企业，进而为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中小微企业配置更多的金融资源。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点，也可有效降低金融企业、核心企业凭借优势地位蚕食中小微企业利润的风险，而且，区块链技术还可实现供应链金融数据的可追溯和不可篡改，进而为企业经营营造可信环境。金融企业可凭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实体经济数据，深度挖掘、揭示数据背后的有用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更准确、更具体的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可有效限制虚拟资本膨胀，缓解金融风险。

4.3.2.3 增强金融监管实时性，创新金融协同监管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有价值证券预期收益的乐观估计，会使他们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领域进行投机，而金融监管还存在的漏洞又给金融机构留下了投机空间，因此，对于金融市场的干预和监管变得异常重要。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加复杂的金融市场和依然存在的投机行为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174]，进而保障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降低金融风险。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要素的分析和挖掘可有效增强金融监管的实时性，提高金融监管的效力。例如，新三板、北交所基于大数据平台创建的新三板市场监察系统可基于数据分析提供异常报警和原因分析等服务。基于大数据平台，该系统还可实现海量数据的整合，实现对于违法违规线索的动态跟踪、实时监控，进而提高金融监管的

效力。^[175]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智能化风险分析工具可实时评估动态数据，实现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缓解金融风险的增强趋势，增强风险监管的前瞻性和全面性。金融机构可在区块链上存储交易信息，确保交易信息的可追溯性，而监管机构可凭借链上数据的可追溯性对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和跟踪，缓解信息的不对称问题，防范潜在金融风险。除了可追溯性外，区块链技术还具有不可篡改性 and 可验证性，从而确保了链上数据共享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在数据共享方面，分布式账本的共享数据库透明度更高，数据管理更加的去中心化。监管机构可通过区块链技术获取金融机构的准确交易数据，进行风险评估和监管，提高监管效力，防范金融风险。

为了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克服差异难题，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加强数据的联通和共享。区块链技术的共识算法可实现数据的多级可信移动，满足机构之间数据共享的要求，因此，监管机构之间可自主研发或建立与科技型金融企业之间的联系，凭借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构建监管数据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大数据平台的构建不仅可以减轻监管人员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量，提升数据的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监管机构对于监管数据的深度挖掘和智能整合的要求，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监管效率。平台的构建和数字技术的高效运用可创新金融协同监管，减少监管重叠、越位，真空情况的出现，形成协调、稳健的金融监管生态。

结语

马克思信用理论博大精深，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马克思对于信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视角，认为“信用”是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显然，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系统研究将有利于我国防范化解各种与信用相关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信用风险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学习，梳理出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条件、生成过程和内容体系。马克思信用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原因是其生成的条件，其中商品经济、商品货币关系以及高利贷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是其生成的历史背景；古典学派和同时期学者的信用理论是其生成的理论渊源；信用投机活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发是其生成的现实原因。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生成过程可分为萌芽、成熟和完善三个阶段，这一过程展示出马克思对于信用理论的阐述不断完善和丰备。本文遵照马克思对于信用研究的逻辑思路，先后论述了信用的形式、信用与虚拟资本、信用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作用的总结等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市场经济又是信用经济，信用在助推市场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信用风险问题，所以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指导防范化解信用风险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受限于研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信用理论如何指导信用风险的防范化解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呈现出新的特征，这给我国的信用风险防范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我国信用风险防范对策探究的相关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数字经济在增加我国信用风险防范难度的同时，其所带来的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先进的数字技术，又为我国更好防范化解信用风险带来了新的优势。当前我国面临的信用风险主要为商业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金融风险，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发挥好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指导作用可有效防范化解这些信用风险。

本文虽然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进行了一番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且探究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马克思信用理论对于我国信用风险防范的指导作用，但是文章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待完善的地方。首先，由于文献资源的局限，本文未能全面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其次，受限于文章篇幅，关于银行信用风险的研究仅聚焦于商业银行而未能涉及其他类型

的银行信用风险。再次，本文为了追求理论的完整性，对于信用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加速股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内容也展开了系统论述，但却未能针对这些内容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本文的信用风险防范研究仅局限于国内因素，对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及相应的防范对策研究还存在缺失。鉴于以上不足，本人今后还需继续深化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对于信用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加速股份公司形成和发展内容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信用与货币流通的论述涉及国内国外信用流通问题，这对于研究我国国际贸易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信用风险问题，探究国际信用风险防范对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马克思关于信用加速股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论述对于研究我国企业，尤其是股份制企业的信用风险防范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本人今后会继续加深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进而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74.
- [2][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75.
- [3][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2.
- [4][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8.
- [5][法]弗朗索瓦·沙奈.突破金融危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57.
- [6][美]洛仁·戈尔德纳.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J].国外理论动态，2008（06）：16-22.
- [7][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3.
- [8][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86.
- [9][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9.
- [10]Korefumi Miyata.Karl Marx's Credit Theory[J].Marx-Engels Jahrbuch,2016(1):9-27.
- [11][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05.
- [12][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9.
- [13][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9.
- [14]Grazziotin, Henrique de Abreu,Herrlein Jr., Ronaldo.Sistema de crédito e crises em Marx: o ciclo industrial e as suas fases[J].Economia e Sociedade,2021,30(1):39-62.
- [15]Trigg Andrew B.Reconstructing Marx's Theory of Credit and Payment Crises under Simple Circulation[J].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1,33(4):746-768.
- [16]Edward I. Altman.Financial Ratios,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68, 23(4).
- [17]Lyle S. Alexander.10 Steps to Improved Credit Quality and Profitability[J].The Kansas Banker,2004,94(11).
- [18]Asif Saeed,Qasim Zureigat.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rade Credit and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2020,13(7).
- [19]洪文金，高路明.马克思信用和银行的理论与应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2-14.
- [20]尹莲英，高晓红.《资本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6-138.
- [21]靳永茂.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双重维度及时代启示[J].征信，2022（6）.
- [22]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 1995: 206-211.

[23]洪银兴, 葛扬.《资本论》的现代解析[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350.

[24]邱海平.21 世纪再读《资本论》[M].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415-417.

[25]洪银兴, 葛扬.《资本论》的现代解析[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355-368.

[26]李成勋.《资本论》基本原理求索[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70-172.

[27]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 《资本论》与市场经济[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456-461.

[28]白暴力, 白瑞雪.马克思经济理论: 《资本论》读书笔记: 体系·难点·比较·发展[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667-668.

[29]王国刚.马克思的金融理论研究[M].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0: 65-70.

[30]朱晓宁.马克思信用思想及其启示[D].天津: 天津商业大学, 2011: 32.

[31]付军.马克思信用理论对完善我国信用制度的启示[D].吉林: 长春理工大学, 2011: 23.

[32]黄慧微.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 2020:45.

[33]杨伯峻, 刘殿爵.论语(中英文对照)[M].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08.

[34]夏征农, 陈至立.辞海第六版典藏本[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5014.

[35]戴维·M·沃克, 李双元.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282.

[36]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90.

[37]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89.

[38]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89.

[39]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52.

[4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0.

[41]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EB/OL].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 2022-12-07/2023-12-25.

[42]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EB/OL].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2023-04-27/2023-12-14.

[4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05.

[44]中国发改委.“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EB/OL].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2203/t20220325_1320207_ext.html, 2022-03-25/2023-04-12.

[45]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49.

[46]洪文金, 高路明.马克思信用和银行的理论与应用[M].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197.

- [47]洪文金,高路明.马克思信用和银行的理论与应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97.
- [4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78.
- [49]洪文金,高路明.马克思信用和银行的理论与应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200.
- [5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2.
- [51][美]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3.
- [52]孙智英.信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80.
- [53]孙智英.信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82.
- [54]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128.
- [55]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128.
- [56]刘絜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106.
- [57]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141.
- [58]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143.
- [5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4.
- [6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62.
- [6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64.
- [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
- [6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
- [6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
- [6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
- [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
- [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
- [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
- [6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3.
- [7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65.
- [7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66.
- [72]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7.
- [7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2.
- [7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50.
- [7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42.
- [7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1.

- [77]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208.
- [7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50.
- [7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54.
- [8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54.
- [81]张燕喜,石霞.《资本论》与中国经济理论热点[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169.
- [8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5.
- [8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7.
- [8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6.
- [8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6.
- [8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9.
- [87]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64.
- [88]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66.
- [8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9-590.
- [9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90.
- [9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90.
- [9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4.
- [9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91.
- [9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0.
- [9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2.
- [9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6.
- [9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2.
- [9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6.
- [9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2.
- [10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3.
- [10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3.
- [10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3.
- [10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2.
- [10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6.
- [10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4.

- [10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5.
- [10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0.
- [10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0-651.
- [10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1.
- [1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0.
- [111]洪远朋.通俗《资本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285.
- [1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II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76.
- [1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3.
- [1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4.
- [1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5.
- [1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5.
- [11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5.
- [1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5.
- [11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4.
- [1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7-498.
- [121]白暴力，白瑞雪.《资本论》读书笔记——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难点、比较、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667.
- [1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85.
- [123]白暴力，白瑞雪.《资本论》读书笔记——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难点、比较、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667.
- [12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47.
- [125]国家统计局.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0%[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1/t20230131_1892601.html，2023-01-31/2023-11-12.
- [126]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22年）[EB/OL].<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2022/2023-11-12.
- [127]国家统计局.2023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9.0%[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10/t20231027_1943963.html，2023-10-27/2023-11-12.
- [128]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2.3%[EB/OL].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899027.html，2016-01-27/2023-11-12.
- [129]国家统计局.2023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9.0%[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10/t20231027_1943963.html

v.cn/xxgk/sjfb/zxfb2020/202310/t20231027_1943963.html, 2023-10-27/2023-11-12.

[130]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22年)[EB/OL].<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2022/2023-11-12.

[131]国家统计局.2023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9.0%[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10/t20231027_1943963.html, 2023-10-27/2023-11-12.

[132]国家统计局.2023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9.0%[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10/t20231027_1943963.html, 2023-10-27/2023-11-12.

[133]上海票据交易所.2022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EB/OL].<http://www.shcpe.com.cn/content/shcpe/research/marketE.html>, 2023-01-20/2023-11-12.

[134]上海票据交易所.2023年9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EB/OL].<http://www.shcpe.com.cn/content/shcpe/research/marketE.html>, 2023-10-27/2023-11-12.

[13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2022年)[EB/OL].<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458449/4458453/index.html>, 2022/2023-11-12.

[136]上海票据交易所.2022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EB/OL].<http://www.shcpe.com.cn/content/shcpe/research/marketE.html>, 2023-01-20/2023-11-12.

[137]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2023年)[EB/OL].<https://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780803/4780807/index.html>, 2023/2023-11-12.

[138]上海票据交易所.2023年9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EB/OL].<http://www.shcpe.com.cn/content/shcpe/research/marketE.html>, 2023-10-27/2023-11-12.

[139]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2022年)[EB/OL].<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458449/4458453/index.html>, 2022/2023-11-12.

[140]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2022年)[EB/OL].<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458449/4458453/index.html>, 2022/2023-11-12.

[14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2023年)[EB/OL].<https://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780803/4780807/index.html>, 2023/2023-11-12.

[142]中经数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限额以上批发业资产负债率、限额以上零售业资产负债率、限额以上住宿业资产负债率、限额以上餐饮业资产负债率[D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10-16/2023-11-12.

[143]中经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D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10-16/2023-11-12.

[144]国家统计局.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0%[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

jfb/zxfb2020/202301/t20230131_1892601.html, 2023-01-31/2023-11-12.

[145]国家统计局.2023 年 1—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9.0%[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10/t20231027_1943963.html, 2023-10-27/2023-11-12.

[146]孙博.通过案例看电子商业汇票的风险防控[J].经营管理者, 2022 (08): 90-91.

[147]上海票据交易所.2023 年 9 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EB/OL].<http://www.shcpe.com.cn/content/shcpe/research/marketE.html>, 2023-10-27/2023-11-12.

[148]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2022 年)[EB/OL].<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458449/4458453/index.html>, 2022/2023-11-12.

[149]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54.

[150]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27.

[151]中经数据.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_期末[D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52]中经数据.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_期末、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_期末、商业银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_期末[D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53]中经数据.商业银行存贷比_期末[E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54]中经数据.商业银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_正常类贷款_期末、商业银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_关注类贷款_期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_期末[E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55]中经数据.商业银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_关注类贷款_期末[E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56]中经数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_期末[E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57]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3 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季度)[EB/OL].<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09305&itemId=954&generaltype=0>, 2023-08-18/2023-10-13.

[158]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3 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季度)[EB/OL].<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09305&itemId=954&generaltype=0>, 2023-08-18/2023-10-13.

[159]中经数据.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_期末[E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60]中经数据.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_期末[E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61]中经数据.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_期末[E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08-18/2023-10-13.

[16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3 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季度)[EB/OL].<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09305&itemId=954&generaltype=0>

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09305&itemId=954&generaltype=0, 2023-08-18/2023-10-13.

[163]杨玉峰, 吕杨, 刘佳琪.关于银行业拥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新形势的思考[J].国际金融, 2021 (11): 47-54.

[164]闫衍.疫情冲击下新一轮信用扩张与宏观杠杆趋势[J].金融市场研究, 2020 (09): 66-76.

[165]边万莉.2022 年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 1.36 万亿 未来信用扩张有望继续加力提效[N].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3-01-11 (001).

[166]国家统计局.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4.0%[EB/OL].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1/t20230131_1892601.html, 2023-01-31/2023-12-14.

[167]国家统计局.2023 年 1—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7.8%[EB/O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1/t20231127_1944914.html, 2023-11-27/2023-12-14.

[168]中经数据.商业银行净利润_累计[DB/OL].<https://ceidata.cei.cn/>, 2023-11-13/2023-12-14.

[169]中国人民银行.国内各类债券统计表 (2023 年) [EB/OL].<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780803/4780808/index.html>, 2023/2023-12-14.

[170]中国人民银行.股票市场统计表 (2023 年) [EB/OL].<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319/4780803/4780808/index.html>, 2023/2023-12-14.

[171]上海票据交易所.2022 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EB/OL].<http://www.shcpe.com.cn/content/shcpe/research/marketE.html>, 2023-01-20/2023-12-14.

[172]任保平, 王思琛.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逻辑机理与推进策略[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03): 85-93.

[17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79.

[17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9.

[175]胡杨.推进金融监管科技建设[N].中国银行保险报, 2023-05-25 (005).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黄玉学，方前移.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依据与路径研究[J].绥化学院学报,2024，44（03）：20-22.
- [2]黄玉学，方前移. 机理·困境·路径：数字经济助力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J].黑河学院学报, 2024.
- [3]黄玉学，方前移. 数字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基于马克思银行信用理论视域[J].工程经济，2024.

致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的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涯已接近尾声。在此，我满怀感激之情，向所有给予我关心、帮助和支持的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方前移教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在给予我悉心指导和鼓励的同时，也非常尊重我个人的想法。此篇论文从选题、框架构建、文献查阅、论文写作和修改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导师的智慧和心血。在生活中，当我遇到困难时，导师会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导师的开导和鼓励让我坚定信心、勇往直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逐渐走向成熟。在考博方面，导师更是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增强了我的考博信心。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深深影响着我，必将指引我未来的道路，使我终身受益。

其次，我要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各位老师。在硕士研究生期间，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不仅让我学到了专业知识，为我打开了学术的新视野，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此外，我还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的图书馆、学习中心等学习场所。这些场所丰富的学习资料和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我能够专心于学术研究，不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

再次，我要感谢读博的学长苗智慧。在我考博的过程中，学长给我传授了很多的学习经验，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学长的指导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考博决心。同时，我要感谢吴凡学长和刘亚蕊学姐。吴凡学长是我进校认识的第一人，他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让我很快适应了研究生生活。在他的引荐下，我有幸成为方前移教授的学生并认识了刘亚蕊学姐。平日里，我经常与他们打乒乓球，交流学习和共同参加活动。我们一起参加了第八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并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获省级银奖，一起参加了安徽省“大学生讲思政课”展示活动，并获皖南片区赛三等奖。此外，刘亚蕊学姐邀请我参与了她的院级项目，这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而且提升了我的实践能力。在职业选择和规划方面，他们无私地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见解，让我受益匪浅。我要感谢我的同门李东。李东作为我的室友，在我的生活上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还共同学习、一起参加活动，在第八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高教主赛道铜奖。我还要感谢我的学弟程梓林，学妹杨宇敏、汪艳和张梦雨。在学习上，感谢他们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在生活上，你们的活力和热情感染着我，让我更加积极面对生活。此外，我还要感谢王琳和姚金昆同学。他们在我的学习和职业规划过程中，无私地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让我明晰了前进的道路和少走了不少弯路。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的考研过程中，我的家人就一直尊重我的选择，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在我脱产求学的过程中，他们无怨无悔，辛苦劳动，给予我无尽的支持和关爱，成为我求学

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正因为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才能专心于学业，追求自己的梦想。

感谢各位论文评审专家，感谢您们对我的学位论文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宝贵建议。您们的专业评审必将让我受益匪浅。我也会继续坚持学无止境的理念，尽最大努力成为一名有用之人。

谨以此文，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祝愿他们都能健康平安，幸福美满！

尚德敏学 唯实惟新

